

各级领导干部关于写好 公文的经验文章集锦



帮你写公文倾情整理

(说明：本合集内容均整理自各专业领域杂志，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请大家在参考过程中严禁上传网络或者用于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目 录

- 习近平总书记对起草文稿的三点要求 3
- 毛泽东教我们写公文 9
- 毛泽东怎样写公文：逻辑清楚 文字兴致勃勃 16
- 毛泽东如何运用公文 23
- 再学毛泽东审改公文 30
- 毛泽东文风特点 37
- 毛泽东文章的独特风格 55
- 从毛主席《给胡乔木的信》学公文写作 78
- 向周总理学审改公文 81
- 胡乔木怎样写公文 88
- 胡乔木的文章写作“经” 106
- 朱维群有关公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109
- 庄聪生同志关于怎样写好领导同志讲话稿 117

习近平总书记对起草文稿的三点要求

文风即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对秘书起草文稿的质量有何要求？他如何看待文风的重要性？在此前一些公开讲话或《之江新语》等文稿中，习近平曾有明确而精辟的论述。

习近平就进一步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向大家提三点要求，归纳起来是六个字：求短、求实、求新。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并不是说凡是长文就一定不好。有些重要的内容，有些深刻的道理，该强调的还是要强调。

一、提高文稿起草质量的三点要求

我就进一步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向大家提三点要求，归纳起来是六个字：求短、求实、求新。

求短，就是要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记得前两年我就和你们讲过。起草文稿要做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就是说，一要短小精悍，二要有所创新。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讲话都要求全，过于求全就会失去重点，就难以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现在的一些讲话稿，讲得很全面，但篇幅太长，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加以改进。今后我的一些讲话，时间要限定

得短一点，尽量把文字量压下来，这样可以更加突出重点，给人以精练、利索的感觉，还可以提高会议效率。

求实，就是要追求朴实的文风，所用的语言不一定华丽但要准确，要实实在在，直奔主题，言简意赅，实话实说。要多用事例、数据来佐证，增强文稿的说服力和逻辑性。

求新，就是要根据特定的讲话场合写出有特色、有新意的文稿。写文章虽然有一定的模式和规律，但也不要千篇一律，老是拘泥于三段论。有时候形式一变，往往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求新既可以体现在谋篇布局上，也可以体现在遣词造句上，适当的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的比喻、排比、对仗等修辞方法，都可以增加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摘自 2004 年 12 月 9 日在省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的谈话

二、文风也能体现作风

在一定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就像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像“懒婆娘的裹脚”。

要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扔到垃圾桶里去，其实诀窍很简单，可用郑板桥的对联概括为“删繁就简三秋

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就是要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

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诸如“穿靴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料、空话连篇、套话成串、“大而全”“小而全”等弊病，都要防止和克服。

当然，我们提倡短文、短话，并不是说凡是长文就一定不好。有些重要的内容，有些深刻的道理，该强调的还是要强调。总的原则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倡导短风，狠刹长风。“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为文也是这个道理。

——摘自 2005 年 8 月 19 日《浙江日报》“之江新语”
专栏文章

三、文风体现干部的能力和水平

文风也能体现一个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有的人讲话光风霁月，让人觉得简单明了透彻，而有的人讲话云遮雾绕，让人捉摸不透。领导干部要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在讲话中勇于坚持对的、反对错的，观点鲜明，态度明确。

对于工作，对于问题，对于群众，绝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云遮雾绕，玄之又玄，其实是能力不够、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问题的是非对错，又

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能装腔作态，故作高深。

——摘自 2005 年 4 月 27 日参加综合一处党支部先进性教育活动组织生活会时的讲话

四、再提“短实新”，倡导优良文风

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改进文风的首要问题。针对上面所说的不良文风的三个字（习近平在本文上一部分“为什么要大力改进文风”中指出：“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我想另外提出三个字，就是短、实、新。

一是短。就是要力求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古人说“删繁就简三秋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 114 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

1975 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当然，也不是说长文章一概不好。有内容、有见解的长

文章，人们也是喜欢读的。文章长短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宜短则短，宜长则长。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有些非长不可、篇幅短说不明白的事情则可以长些。

《庄子》上有这样几句话：“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意思是说，野鸭子的腿虽然很短，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就今天来说，把“野鸭子的腿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提倡短文章、短讲话、短文件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

二是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

这就要求我们的文件、讲话和文章，力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问题要客观、全面，既要指出现象，更要弄清本质；阐述对策要具体、实在，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要深入浅出，用朴实的语言阐述深刻的理论。

要有感而发，情真意切。毛泽东同志笔下的愚公、白求

恩、张思德，我们今天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些人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激烈震荡，所以讲出的话饱含深情、富于哲理，能深深植入人民心里，引起共鸣。

这里需要说明，一些关于党和国家工作的总体性要求，事关全局，事关党和国家前进方向及政策连续性，事关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需要在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这和形式主义的套话、穿靴戴帽是两回事。

三是新。就是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正所谓“领异标新二月花”。如果一个文件、一篇讲话毫无新意，那么制定这样的文件、作这样的讲话还有多少意义呢？可以说，能不能讲出新意，反映一个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经验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这里所说的新意，既包括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前人没有讲过的话，又包括把中央精神和上级要求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在解决问题上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的话；既包括角度新、材料新、语言表达新的话，又包括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生动活泼的话。需要指出的是，讲出新意，并不是要去刻意求新，甚至搞文字游戏。更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去标新立异。

——摘自 2010 年 5 月 12 日在中央党校 2010 年春季学

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来源：人民论坛网）

毛泽东教我们写公文

毛泽东多次要求，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把向全党所提的要求，充分体现在他所起草的文件中。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还是文章大家。他不仅开创了政论文写作的新生面，也开拓了公文写作的新天地。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公文，同时在公文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他用丰富的实践和深刻的理论，指导我们如何写好公文。

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公文是党政机关行使职能的重要工具，在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和推进各项工作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己动手写公文是领导干部理所当然的工作，也是其领导才干的体现。

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毛泽东高度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亲自

动手写公文。1948年，毛泽东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1964年，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严肃批评：“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末，部长、局长就可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

毛泽东不但把亲自动手写公文的要求下发全党严格推行，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通知、指示、命令、电报，等等，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中的有340多篇；他还亲自阅读修改了难以计数的公文，在《毛泽东年谱》中可以详细地看到有关记载。

有位外国名人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所战胜。”刀枪是什么？武器、实力和行动。思想是什么？战略、策略和方法。新中国是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出来的，而革命的枪杆子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因此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那支凝聚其深邃思想的如椽大笔。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从1948年7月开始，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普通农舍中，亲手拟写了 408 封电报，以高超的智慧和雄伟的气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史诗。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说，靠的也是毛泽东那支如椽大笔。1955 年 9 月至 12 月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认真阅读了从各地征集上来的 200 多篇调查报告，精心挑选出 176 篇，进行编辑、修改，并为其中 104 篇撰写了按语，为全书撰写了序言。毛泽东用这部“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为全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一生亲自拟写公文之勤、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中外政治领袖中可谓独领风骚。

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

毛泽东十分厌恶“官样文章”，他严厉批评假、大、空的公文：“讲了一万遍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毛泽东对公文有深刻的见解。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期间、新中国建立前后和 1958 年前后，他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涉

及公文的文风，公文写作的原则、语言、文字、修辞等。

毛泽东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他说：“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指出，文件“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好的文件标准，“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公文的最高境界，莫过如此。

对于公文写作，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例如：“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代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的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又如：“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再如：“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

毛泽东像语文老师一样，认真阅读和批改党内公文，悉心进行指导。

有的文件“不扎实，轻飘一些”。毛泽东指出，这是起

草人“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他要文件起草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有的文件缺乏说服力。毛泽东致信有关部门领导：“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

有的文件写得不够精练。毛泽东批示：“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

……

在公文指导上，毛泽东不仅高屋建瓴，切中要害，还殚精竭虑，不厌其烦。因为小公文关乎党和国家的大事业。

亲身实践，毛泽东这样写公文

与他的政论文相同，毛泽东的公文也写得潇洒自如，独树一帜，没有丝毫的八股味道。

毛泽东深悉公文的真谛，把准确性列为“三性”之首。公文主要用来传达要求，指导工作，必须准确无误，通俗直

白。革命斗争时期，环境艰险，形势骤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治国安邦，百业俱兴。这一切都容不得半点含糊，说半句空话。毛泽东起草的电报、指示、决定等，全是一对一、实打实，围绕重点，直指中心。

1948年3月14日，解放军攻克洛阳，不久撤出。4月5日，解放军再度攻克洛阳。8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起草并发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电报940多个字，在开头作出“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的判断后，随即提出九项应注意的政策。例如：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等等。新政策明确、清晰，既易于理解，又便于执行。

毛泽东多次要求，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明确提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毛泽东把向全党所提的要求，充分体现在他所起草的文件中。

有人对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作过统计：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与闭幕词，两个文件加起来3000多字；有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指挥的电文，长的《关于

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 2000 字，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足 800 字；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指示与通知，两份文件加起来只有 700 多字；《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仅 548 个字。

1973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给反映问题的知青家长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仅有 34 字的复信，极大地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主张，公文也要生动，讲究词章。现实中，有些公文形式刻板、套话连篇、缺乏生气。毛泽东所写公文则不然，在准确、鲜明的同时，还力求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祭黄帝陵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虽然是政治性很强的公文，却汪洋恣肆，文采飞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 1930 年 1 月 5 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在信结尾，毛泽东预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并满怀激情地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贴切的比喻、壮观的排比和诗意的语言。谁会想到，它们出自党内的严肃通信？——这就是举世

无双的毛泽东。

（来源：《刊授党校》 作者：苏马）

毛泽东怎样写公文： 逻辑清楚 文字兴致勃勃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在明清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征，曾起草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曩檄》的骆宾王。总之，这些公文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究其原因，半是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

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 1948 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 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因为这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面对之事大多为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 408 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

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泽东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泽东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泽东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泽东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杯》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觉得不该是大人物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

“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公文属应用文之列，首先的要求是实用，陈言务去，不要套话，直指核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多偏重思想理论的务虚，这一类则是实打实、一对一的工作指导。公文

不是用嘴，是用笔，它遵循的是文字写作的规律，又是指导工作的原则。所以一要准确，二要平实。准确，就是一针见血，说出你的思想，你的要求，你到底要干什么。战争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都容不得半点含糊。平实，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说什么，不要东拉西扯、穿靴戴帽。同样，那时的形势也容不得你虚与委蛇。

毛泽东在 1951 年 1 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中特别加了一段：“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这就是说公文的目的是要人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他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948 年 4 月毛泽东草拟的《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文 900 多个字，条分缕析，将我党进入城市后的新问题、新政策说得一清二楚，既好理解又便于执行。

不要以为准确、平实是起码、简单的要求，人人都能做

到。实际情况是平实最难，正如真人难做。无论一个团体、政党还是政府，当上下都已形成老一套时，这个团体、政党、政府也就老了。与这个“老”相配套的就是空话、老话、套话，写文章就拿腔拿调。韩愈、欧阳修反对的时文是这样，明清的八股文是这样，延安整风运动反对的党八股也是这样。党老则僵，政老则虚，师老兵疲，文走形式，这是政治规律也是文章规律。

“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们看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电文，最长的一篇《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不过 800 字；党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这么大的事，只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指示，一个通知，加起来 700 多个字。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拟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

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只有 100 多个字，英雄不朽，文字不朽。

现在是和平时期，屁股后面没有枪声，我们就更喜欢喝着茶开会，摆开架子念报告，传达一个文件，动辄上万字。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真正有权威的上级机关或个人是从来不须多言的。只有无权威时才拉旗扯皮，虚造声势，才要长文。而文章一长，人们不读不看等于没有写。明知无用为什么还要写、要发呢？又长又空的文风是毁政之兆，魏晋的清谈、明清的八股就是例证。

“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公文最讲平实，亦容易陷于枯燥，但毛泽东写公文也力求生动。他的审美追求无处不在，于鲜明、准确、实用之余，还有几分潇洒，这又见出他文人气质的一面。

一般来讲，公文写作要求明白、简洁，不一定求美，但是你不能折磨人。作为最高领袖，毛泽东每天要看很多公文，你老折磨他，他也是要发脾气的。1958 年 9 月 2 日，他批示《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时震怒了：“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

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讲了一万遍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在毛泽东眼里，公文要起调动情绪、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作用。怎样才起作用？除内容外还靠语言的生动，靠美的感召。他说，“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

公文主要是说事、说理，但也不完全排斥形、情、典，用得好事半功倍。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自古实行文官政治，当上官的文章大都过关，所以许多公文亦是美文，传为佳话。西晋时期李密的《陈情表》是一封写给皇上的拒绝当官的信，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一封两军阵前的劝降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一份议政的奏折，都是长盛不衰、留存于文学史的。

现存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中的公文中亦有不少美文，如《祭黄帝陵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在《宣言》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

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这是号召，是动员，也是抒时代之情。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梁衡）

毛泽东如何运用公文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用的 47 类材料全部来自基层农村火热的实践，包含了办农业合作社方方面面的经验。毛泽东用这部“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为全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公文是党政机关行使职能的重要工具，在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认识，指导和推进各项工作上，具有极大的权威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公文的作用，经常亲自动手起草公文，用公文来统一思想、指导工作、推进工作。

如今党政机关已经实现了办公现代化，但是，公文的特定功能却丝毫没有改变。毛泽东重视公文、运用公文的做法，对新时期的领导干部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用党的文献统一思想认识

我们党诞生以来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它们不仅是党内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据，也是党不断成长发展壮大的记录。“注重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提出并运用党的文献教育领导干部，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第一人。

从1942年2月开始，我们党进行了三年多的延安整风。之前，党发生过多“左”倾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包括有些高级干部，对这些错误缺乏正确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的活动，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统一认识。因此，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把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

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编辑《六大以来》这部文献集。《六大以来》分上卷、下卷，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等，共约280万字。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选出86件重要文献，既有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也有党在这个时期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

定与形成的文献。由这些文献组成《六大以来》选集本。随后，毛泽东还编辑了《六大以前》、《两条路线》。

作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六大以来》等三部党的文献对统一全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召开党的七大做了很好准备。

用电报指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初起，电台成为我们党向各地党组织下达斗争指示的一个秘密工具，同时成为红军总部向各红军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的一个重要利器。毛泽东更是出神入化，把电报运用到了极致。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一间普通农舍里，奋笔疾书着一封封电文，以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智慧，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 24 场战役，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导演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史诗剧。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1948 年 2 月，毛泽东在陕北时就开始考虑东北的解放战局，致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高级将领，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首先打锦州方向的战略设想。此后，毛泽东在关注和指挥其他战场作战的同时，反复用电文与林罗刘商谈东北主力行动问题，由提议“南进作战”，到督促东北野战军南进，再到严令“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集中

主力先打锦州。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1月2日胜利结束。毛泽东极其兴奋，密切关注着这场大决战的进程。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随时阅读林罗刘发来的战况电报，周密思考战役的各个环节，及时起草和回复电文，对战局的走向作出科学判断。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了77封电文，其中战役打响前31封，战役打响后46封。

辽沈战役结束后第四天，即11月6日，毛泽东又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打响了淮海战役。在这场65天的大战役中，毛泽东给前线指挥部发出64封电文。淮海战役发起23天后，11月29日毛泽东又指挥打响了平津战役。在这场64天的大战役中，他起草和签发发往前线的电文有89封。

300多个日日夜夜，400多封电文，包括辽沈、淮海、平津在内的全国各战场的24场战役，毛泽东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以超人的战争指挥艺术，调动着人民解放军的千军万马，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用典型材料指导农业合作化道路

典型材料是工作实践成果的总结与提升，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运用典型材料，可以指导下级很好地开展工作，或者进一步改进工作。毛泽东一贯重视典型材料指导工作的作用。

他在中央苏区时推广过“模范兴国”的典型，在延安推广过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典型。1955年，他又推广了王国藩“穷棒子社”等一批典型。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热情关注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兴起，积极支持和推动农民走共同致富的集体化道路。然而，由于合作社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如何办好农业合作社、如何将办起来的农业合作社巩固下去等实际问题，不是十分清楚。为了指导各地办好农业合作社，毛泽东想到了已经成功的典型经验。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集中精力、倾注心血，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仔细阅读从各省市自治区收集来的200多篇材料，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176篇。他像老师改学生作文一样，认真逐篇修改材料，再三推敲每篇题目。他还为104个典型材料撰写了按语，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分上、中、下三册，1956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约90万字，选用的47类材料全部来自基层农村火热的实践，包含了办农业合作社方方面面的经验。其中有：艰苦创业、勤俭办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穷棒子社”、山西省平顺县李顺达生产合作社；

善于管理的吉林省安广县四一农业合作社；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毛泽东用这部“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为全国农业合作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用“内参”来推进“新三反”运动

“内参”是指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1949年9月2日创办，是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的综合性机密刊物。它主要刊登“党的各项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所发生的新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内参”是我们党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文。毛泽东很看重《内部参考》，每天必读。他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他既把《内部参考》当成及时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又将它作为促进问题解决的一个有效载体。

1952年11月，毛泽东阅中共山东分局的一份报告，内容是针对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省领导机关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做法。毛泽东得知山东省政府曾积压了7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马上想到，“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于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953年1月5日下发，同时还转发

了山东分局的报告，要求各地“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可是直到1月底，各中央局、省委及市委都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

1月30日，毛泽东看了《内部参考》刊登的《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道，便要新华社指示各省市分社照此办法，集中围绕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等问题采访，并将其中的典型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促请他们注意。毛泽东希望借助“内参”这一载体，来揭露各地存在的问题，推进“新三反”运动。

新华社立即将毛泽东下达的任务布置给各地分社。到3月31日，《内部参考》刊出31篇相关报道，反映各地存在着几个突出问题：强迫命令在基层干部中很普遍；违法乱纪以基层干部打人为最普遍；高级干部则以官僚主义态度最普遍，还有的包庇下属，或对批评者打击报复。这些报道引起了各地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随即派人调查处理，并将结果刊登在《内部参考》上。由此，“新三反”运动有效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通过每天必读《内部参考》，了解各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借助它来指导工作、推进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关于《内部参考》的41篇批示，对此做了充

分的印证。

（摘自：《刊授党校》 作者：苏马）

再学毛泽东审改公文

1957年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着意突出了“整风运动”这一主题，让人过目不忘。

毛泽东非常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动建设中的作用。他不仅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还认真审阅修改了无数的公文。笔者曾经从准确把握政策等五个方面介绍了毛泽东审改公文的具体事例（见《刊授党校》2014年第11期）。现在再谈谈毛泽东在审改公文中突出公文主题等方面的实践，希望能够进一步帮助领导干部学习和领悟毛泽东审改公文的思想和方法，以提高起草、审阅、修改和运用公文的能力与水平。

突出公文主题

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部署工作、推进工作的重要工具。工作有中心，所发公文也必须围绕中心、突出主题，题目要让人们一目了然。毛泽东撰写文章、起草公文的时候

都非常重视题目的拟定。他在审阅公文的过程中，如果感到文件主题不够突出、不够准确，也会亲自动手，认真修改。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三部文献集。他对每篇文献都进行了精心审核，还对某些文献的题目做了修改或加了题注。如，他将《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取得胜利?》这个文献题目，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文献题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六个字。毫无疑义，这两份文献都非常重要，原来的题目在当时也较好地概括了中心主题。尽管如此，后来者如果只看这两份文献的原来题目，未必立刻知道一个是“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个是“遵义会议决议”。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加注后，两份文献的阅读效果就明显提升了，给人一种议题鲜明，一望而知的感觉。

党的机关报社论也属于公文，传达的是党和政府的精神与声音。毛泽东很重视党的机关报社论的作用，或亲自动手撰写社论，或亲自拟定社论题目，或亲自审阅修改社论稿。1952年7月1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将《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的标题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并在社论稿末尾加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修

改这篇社论的标题？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批示中做了专门说明：“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毛泽东改题后的《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很好地突出了主题，也是送给日本共产党30周岁生日最好的祝词。

紧扣实际拟题

毛泽东说过，写文章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起草公文也应当这样，注意讲究拟题，准确概括出公文的实质内容，让人一看便抓住重点，记住关键词。毛泽东在审阅公文的时候，也常常根据内容来修改题目，使它更醒目、更能突出重点。公文题目该短则短，该长则长。

党的中央委员会研究并作出重大决定的文字稿，是权威而郑重的文件，其题目应当如何拟定？作为党的领袖和文章大家，毛泽东在这方面提供了范本。1957年，中央拟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他将文件稿的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原题目有34个字，改后仅9个字，着重突出了“整风运动”这一主题，让人过目不忘，入脑入心（中央这个决定草案后来没有下发，但是毛泽东对这一题目修改的实践，对我们依

然有着学习和启示的作用)。

毛泽东每天必读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把它当作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解决各种问题的一个有效载体。可以说，“内参”是我们党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文。1958年11月14日，毛泽东阅《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将标题改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他同时批示，这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原标题只侧重于反映情况。毛泽东修改后，增加了12个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好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注意，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公文题目长与短这个问题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和作风。

力求通俗易懂

毛泽东非常厌恶官腔官调的八股文。延安时期，他曾在《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演讲中历数党八股八条罪状，三、四条是写文章、作演讲“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后来，毛泽东还反复讲这个问题，强调公文应当通俗易懂，能够“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

在审改公文的时候，毛泽东也很注重语言文字的通俗。

1954年3月23日，他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宪法的通俗性、普及性，为的是让人民群众能够读懂和掌握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他讲到对宪法草案的文字修改，举例说：“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人民领袖为人民，在制定和修改宪法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坚持倡导好文风，看到鲜明生动的公文就给予赞扬，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学习。1959年3月26日，毛泽东阅安徽省委报送的简报，内容是该省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体制及有关问题的一些规定。他觉得“这个文件，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还让他高兴的是，这份简报很通俗易懂。毛泽东写下批语：“写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喜悦之情，溢于笔端。

对于让人“看不懂的文件”，毛泽东则会开诚布公地进行批评。1959年4月5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毛泽东专门讲到“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相当多看不懂的文件，而主要出于我们工业界。“我希望以后不要拿出这样的文件来，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同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阅一份工业生产建设的报告时，写下内容相近的批语：“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反复提醒与告诫，可谓苦口婆心。

坚持文字简练

公文主要用来部署工作、指导工作，重在管用实用。这就要求它必须准确、简练，开门见山，直指核心，不能含糊不清，或穿靴戴帽。毛泽东历来反对讲空话、套话，凡是谈到写文章、写公文的时候，总是强调要文字简练。他在审阅修改公文的时候，也经常提出同样的要求。

党的机关报的社论要文字简练，去掉废话。1955年6月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并致信负责宣传的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

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同时进行指导和提出要求，为的是帮助提高党报社论的水平。

党的会议中的有关文件，也要文字简练，还要清爽好看。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用了很多时间来审阅修改大会文件。8月22日，他在党的七届七中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报告稿（指八大政治报告）9万字，能缩减三分之一就好。”对于大会发言，毛泽东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24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后，写批示，“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27日，他审阅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并批示：“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修改稿的时候，则批示说：“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在毛泽东的指导和要求下，党的八大会议文件稿在原基础上有了新提升、新突破，成为载入党的历史的重要文献。

（来源：《刊授党校》 作者：苏马）

毛泽东文风特点

题记：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毛泽东是伟人，是政治领袖，也是文章大家。从来的纪念都是对历史的盘点和对未来的设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积累下不少问题，在文风方面更是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史为镜，这也是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毛泽东说过：“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所以，重提毛泽东的文风，研究它、学习它，实际上是对现实中某些不良文风的批评和对良好文风的呼唤。

上篇

毛泽东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几个侧面。从今天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可以从其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来认识和领会。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即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

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是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种高屋建瓴、酣

畅淋漓的气势。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一段文字由周恩来手书，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两个伟人的作品，文章、书法都可谓中国最大的一块“双绝碑”。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其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写的一首诗《咏青蛙》就气度不凡：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他在青年时期办《湘江评论》，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讲：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生绝不服软，绝不示弱，他的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和王者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称法之所以得到认同，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的战略思想。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为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如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战略；解放战争时期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政权之初的反贪廉政；还有一系列的建党、建军思想。

二是具体的思想。他在谈每一个具体的、个性的问题时，总能归纳出本质的、共性的哲理。这就是领袖，政治领袖，思想领袖。所以他的文章总是那样耐读，有味，并让人永远地记住。他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讲当时的军事形势说：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在许多地方被人引用。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这样的至理名

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成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综上所述，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

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

“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宏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水浒传》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

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

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现在，手机上调侃的段子也常用这种形式。如“曾经沧海难为水，大锅萝卜炖猪腿；在天要做比翼鸟，相约今天吃虾饺；君问归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盘鸡”，都很幽默。

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这里从“法宝”的字面引出下文。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即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

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的文章，是在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没耐心听课，就去翻书上的插图。有一张《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印件，如蚂蚁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开头几句所吸引：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我看到“欣欣向荣、愁眉锁眼、甚嚣尘上、打入闷葫芦”这么多新词，不觉眼前一亮，一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说不清是雅，是俗，只觉得新鲜，很美。放学后，我就回家找来大人的《毛泽东选集》读。我就是这样开始读毛泽东的文章的，开始并不为学政治，是为欣赏语言，读文学。

我们先看毛泽东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有这样几句：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再看他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一文中的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走到一起”、“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再看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严肃、大气的文

字：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轻松漂亮的姿态完成高难动作，如足球的倒勾射门，篮球的背投。政论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讲清艰深的政治道理。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在 1956 年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

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下篇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什么秘诀，是规律，是大白话。如果好算是秘诀的话，主要有三条：一是多读书；二是不脱离实践；三是不偷懒，亲自写。

第一个原因是多读书。

毛泽东读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读得多。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拿破仑到马克思，什么都读。现在，庐山图书馆还保存有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借书单，从《庐山志》《昭明文选》《鲁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话》，内容极广。

二是读书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冈山、延安时期找不到书，他派人到敌占区买。那时八路军驻西安、武汉、重庆等办事处，都有一个任务，就是给延安买书。解放后他出差，随身的行李首先是一个大的木头书箱。他的住处名“菊香书屋”，藏书9万册。他睡一个大木床，有半个床堆满书，就这样常年伴书而眠。而且为了方便看书，有两个床腿还垫高一拳头，床面左右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专从北大请一个教师来给他读书。他在延安时说过：“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满管子，醒过来就看书。最后一次阅读是去世前7小时。

三是认真读，研究，辨析，写了大量笔记、批注。如1958年刘少奇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代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一个领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个不会自己母语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个不熟悉祖国典籍的领导者是不合格的领袖。毛泽东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仅《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 342 条。

第二个原因是不脱离革命实践。

他的文章是用血与火写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写照。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建国，凡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泽东的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从建党到建国，他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最波澜壮阔的时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马恩那样是纯理论，也不像中共的

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那样还不脱文人相，他深入到军事、政治活动中又与工农更密切地接触。这既丰富了他的思想，也丰富了他的语言。

第三个原因是亲自动手。

不管什么样的天才，读了多少书，经历了多少活动，你要转化为文章，还是得亲自去写，多写，常写，熟能生巧，逐渐掌握规律。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亲自动手。他在 1948 年草拟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 年《工作方法六十条》第 38 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毛泽东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他用笔杆子打天下，写公文、论文、新闻，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文体。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 408 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现在，西柏坡纪念馆将这些电报装饰成一个大走廊，是一个很壮观的时光隧道，我们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个岁月。读书、革命、写作这是毛泽东三位一体的人生。

近年来，我们党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改文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去除“假、大、空”。其实，在此方面，今

天的领导干部可以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要学做文，先学做人。我们常说文如其人。现在的问题是假风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复好传统，先破这个“假”字。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认为讲大话、空话、套话、歌功颂德的话最保险，不会犯错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圈内圈外两种表现。现在，干部队伍中作秀风气很盛。没有学问，装学问，让秘书查典故写稿子，讲话背稿子，急着在报上发文章，出书，写传记，编日记，图虚名。这样何谈写文章，更不可能写出毛泽东式的文章。毛泽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始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从不作秀，不装，不假。他在八大开幕词中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获得一致好评和热烈的掌声。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说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个年轻人，我的秘书田家英写的稿。

第二条是去读书。一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应是一个读书人。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乏一些干部本来没有读多少书，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干部或高级干部，到了领导岗位上也不知道赶快去读书补补课，自以为学问也同步见长。还是腹中空空，拿什么来写大文章？读书是获得精神营养，就

像吃饭一样，别人不能代替。读书写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为政的一部分。古人讲“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条是亲自动手。如毛泽东要求的不要秘书代劳。特别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写。如果不会写就不要写。现在问题是不少干部，不写文章，却争署名，要留名。抢着发文章，争版面，托人送稿子，拼书出。朱镕基出版他的讲话实录时特别声明：秘书代写的一篇不收。

当然还有许多，但能先从这三条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会大有起色。

民族复兴离不开文风复兴。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凡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政而发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民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而且是从根子上出了大问题，就像我们看到远处的树林里冒出青烟时，那片林子已经着火了。

我们历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

起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要复兴好的文风，好风凭借力，再用这好风去推动社会改革。

文风是党风、政风的表现，但它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影响党风、政风。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风。那么，如何实现文风复兴？关键是两条，一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领导带头。中央要刹吃喝风，立即就刹住了。说明并不难，但要真抓，还要上面带头。比如当年毛泽东就真抓。说“党八股”是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是个瘪三，瘦得难看。多次下发文件，要领导干部亲自写公文，痛批坏文章，毫不留情面。

有一次，他看了一些会议文件，不满意，大怒。他说：“讲了一万遍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泽东这样严厉地要求下，对坏文风可以说是“露头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滥。而现在坏文风已是沧海横流了，如果毛泽东在世还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现在必须认真对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气，也许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作者：籍忠亮）

毛泽东文章的独特风格

1980年3月2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与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谈话时，由衷敬佩、高度评价毛泽东写的文章，说：文章还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其实，毛泽东写的文章早就普遍受到人们赞扬，连蒋介石也说毛泽东的文笔好。的确，毛泽东写文章，立意高远，豪放大气，文采飞扬，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少年练就好文笔

毛泽东成为文章大家，决非一日之功，他早在少年之时，就已经练就一手好文笔。

毛泽东幼年读私塾时，还谈不上写文章，他对写作发生兴趣，当是1904年秋季，是时，他已经在关公桥私塾学了半年，老师是周少希。周少希喜欢写作，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毛泽东师从他读书，开始对写作感兴趣。1906年秋天，毛泽东又到井湾里念私塾，老师叫毛宇居，是毛泽东的毛姓同辈人，比毛泽东大12岁。他不仅写的一笔好字，还做得一手好文章，在他的教学下，毛泽东对写作更加关注，但那时他的写作限于先生留的课业范围，还谈不上自己立意并写出系统的文章。

毛泽东试笔自己独立写文章，到底是何时，写出何作品？目前已无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独立写作文章，肯定早于他到长沙读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根据是1912年符定一先生对年仅19岁毛泽东的考核。

符定一，字宇澄，湖南衡山人，1877年生于书香世家，既较为全面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文化，是饱学之士，毕业后任资政院秘书。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春，也就是符先生任湖南全省高级中学校长的时候，19岁的毛泽东从韶山来到长沙应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该校录取。符定一觉得一个乡下青年，不一定有如此高的学识，担心在他主持的学校中有“关系生”考入。因此，他亲自复审毛泽东的考卷。当他看到毛泽东的考卷时，大为吃惊，毛泽东考卷中所写文章，立意高远，气度不凡，文风也闲中肆外、纵横捭阖，十分俊雅，连书法也属上乘。符先生深为感染，但他又怀疑这样好的文章是否真正出自毛泽东本人，于是，他决定要亲自面试毛泽东。当传达员把刚刚从湘潭乡下来到长沙的毛泽东领到校长室时，符先生不禁大为吃惊：毛泽东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家纺土布衣服，脚上穿着草鞋，讲着口音极重的韶山土话。他心里暗自思量：这个乡下土孩子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符定一决定要好好考考他。在看似轻松的对话中，符先生向青年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问题，他的问题，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想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看他是否真有学识。但是，不管符先生问什么问题，毛泽东总能对答如流，并且颇有惊人之语，足见毛泽东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见解不凡。符定一不仅打消了怀疑的念头，还认定自己发现了超凡脱俗之才。他以特有的伯乐之心，取出文房四宝，给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让毛泽东写出文章。青年毛泽东稍加沉吟，即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面呈符定一，符先生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可待的文章，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从此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鼓励毛泽东学好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启发毛泽东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通过语文老师柳潜把一部珍藏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毛泽东课外阅读。

上述史实说明，毛泽东写得一手好文章，决不是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开始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只不过这些文章没有留下来，而《商鞅徙木立信论》则在后来被发现原文原稿，人们便认为毛泽东写得好文章的标志从这篇文章始罢了。

从文笔老到到文字激扬

再讲《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写于1912年的一篇文章，写作时间在符定一先生面考青年毛泽东不久的当年

6月，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举行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写的。这篇文章在作文比赛中得了满分，并夺得头名。这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的文笔，已经相当老到。当年以写文章见长的国文教员、晚清秀才、毛泽东的班主任柳潜看到这篇文章时，击节赞赏，给予很高评价。他写下的评语是：“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毛泽东的文章仅500字，柳潜的眉批和总评就有150字，可见他对这篇文章欣赏的程度。最后，全部获奖作文报到校长符定一那里审定，符校长不仅同意阅卷老师柳先生等人的意见，而且特地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首页上批了“传观”两个朱红大字。柳先生还极力向同仁推荐此文。同事们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完全赞同柳先生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文章能够得到这些当年写文章高手的先生们如此评价，说明毛泽东写文章的文笔已经相当成熟，由此反过来想：当年湖南的一些饱学之士对

毛泽东写文章，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清末民初，文人写文章，有一种半文半白的风格。这种文章有它的优点。采用此种文风写成的文章，往往气势磅礴，立论精当，析理透彻，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种文章，显得十分老到，中国近世有成就的文人往往是写这种文章的大家，梁启超就是写这种文章的代表之一。梁启超嗅觉灵敏，立论锋利，思想广博，议论新颖，行文流畅达，文思如涌，极富鼓动性。梁启超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也一直为毛泽东所学习和效法。在学习和效法中，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已经熟练运用此种风格写文章了，他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明显带有梁启超这种文风。

更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又有自己的新风格。他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有“三叹”：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由此三叹可见青年毛泽东已经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写文章是针对国家、民族之积弊，目的是为国为民，因此，他起笔立意极高，著文完全是有感而发。而毛泽东忧国为民之立意也在文章中体现出来。他在文章最后议论道：

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

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毛泽东的老师也从毛泽东这篇文章中看到青年毛泽东的逼人锐气和洞察时代的深刻见地，柳先生不惜笔墨用“恰似报笔”来高度评价学生对于社会时事的关注。“报笔”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柳潜不喜欢学生写那些内容老化，与时代脱节的文章，一向引导他教的学生写文章要有“报笔”之风。他的倡导和引领，为青年毛泽东关注时代风云而写作雄壮阔气的文章，后来又再进一步，随着自身走向波澜壮阔的时代而文笔也转为激扬豪放，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毛泽东最终成为文章大家，毫无疑问，得益于柳潜先生对“报笔”风格的激赏，他的鼓励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件事。解放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青年毛泽东老到，触及时政，言之有物的写文章笔法，既有此前他读书、写作的积累，又受到湖南一师众先生的影响，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当毛泽东走出校门，开始寻

求救国救民之路，特别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文笔有了很大改变——从文笔老到变得文字激扬。随之，他运用白话文多了，但也不是不用古语古文。他的文笔，明显变为文字激扬，大气磅礴。毛泽东 1925 年写的《沁园春·长沙》这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从毛泽东这些诗句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胸怀大志奋发向上的风采。其中“激扬文字”一句，也标志着毛泽东写作文章风格的改变和发展。其实，这也能够从毛泽东早期写作的文章中看到。他写于 1917 年的一篇题目为《奋斗自勉》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意思是与天共同奋斗，与地共同奋斗，与人共同奋斗，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天和人共同前进，才能体会到奋斗的真意和无穷快乐！这段文字的哲理是何等深刻，气势又是何等磅礴！1919 年，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这样的文字：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中的设问和几不怕的回答，正是他文字激扬的体现，青年毛泽东用这种笔法，展现了他为国为民

而奋然前行的锐气。毛泽东与于 1919 年七八月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同样具有这种文字激扬的特点：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文字激扬的基础上，又加深了他析理深透的特点，他一一列出了各类人们的处境，讲出联合起来反抗旧制度的必要。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毛泽东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字激扬加析理深刻的特点，后

来成了他写文章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后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写作，在已经奠定的基础上，又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写下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有论理的，有述事的，有新闻稿，有报告稿，还有公文、评论等等。这些文章，体裁不同，但都体现了毛泽东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了毛泽东特有的文章风格。

立意高远

毛泽东从不随意动笔写文章。他写文章，都是为了分析和解答现实重大问题，并且，他的分析和回答，都是胸怀全局，登高望远，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大处落笔。可以说，毛泽东写的文章，是“管大用”的。这一点常常被谈论毛泽东写作风格的人所忽略。

我们看毛泽东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四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四篇文章，所回答的，都是重大问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纵览当时中国政治全局，对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再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论到湘赣边界的割据，进而谈到湘赣边界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最后论到经济问

题和军事根据地等问题。此文从大处着眼，层层分析，步步解答，最终得出了红军能够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逐步分析中阐述了这种革命根据地存在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中，没有任何标语口号式语句，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是一种沉着冷静风格，是一种述事析理文风，但它的立意则极高，涉及并加以回答的，是当时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立意同样高远，此文从大势和当时需要的具体条件入手，分析中国能够存在独特的革命军队割据政权的原因，又从八月失败在于一部分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根源处剖析，进入对井冈山割据现势的分析，对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作了分析和解答。这篇文章回答了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创造和扩大的必要这个重大问题。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对于当时存在于红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对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解答了红军怎样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立意，无疑重大而又深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针对当时党内和红军中一种悲观情绪而写，但毛泽东没有就事论事地只限于批评，而是从大处落笔，对革命的主观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作了对比分析，

论述了革命力量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必然性，对反革命力量的实质作了分析，对现时的客观情况进行了分析。它回答的是反动势力虽然很强大，但革命力量也必然会发展起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这样重大的问题，立意是高远的。上述毛泽东四篇文章，总起来回答了中国革命可以在农村存在和发展，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赢得胜利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解决了共产党的力量在相对落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管大用”的文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了不少文章，立意同样高远，同样是为了解决大问题的。《论持久战》一文，从国际国内形势大处着笔，对中日战争形势进行了透彻分析，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预测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预见了中国抗日战争必胜的结局，它正确地回答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这篇立意于解答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重大问题的文章，不仅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统一了对于抗战策略的认识，也仅受到了国民党及其军队许多高官的赞同，甚至连日本方面的军事家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此文独具只眼规划宏大，从而惧怕此文中所包含的雄壮力量。从1941年5月到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为延安整风运动撰写了三篇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

《反对党八股》。他写这三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清算曾经统治共产党并且后来在党内许多同志中一直存在的错误思想及其形成的不良作风，立意同样高远。这些文章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也不仅对指导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有长远的认识论意义。《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同样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重大问题而写。当时党内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思想，也有冒险主义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冒险主义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地硬干硬拼。这些错误思想中，以教条主义危害更大。毛泽东就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而写上述两篇文章的。《实践论》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阐述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对党内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批判中，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给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显然也是“管大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的文章同样立意高远。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为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而写的，为了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毛泽东没有轻易动笔，写前，他找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谈话，进行调查研究，又借鉴苏联经验，进行反复思考，最后才写下这篇文章。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党与非党，是与非，中国和外国这七大关系时，都有直接借鉴苏联在这些方面所犯的错误与教训的论述。在这篇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气和毛泽东本人所具有的独到见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的多次讲话中都谈到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可见，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着眼之宏大。而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1957年2月，毛泽东写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同样是为了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重大问题，立意是高远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又提出向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

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在文章中，毛泽东从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入手，进而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和解答，不仅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的典范，也在解决中国当时面临重大问题上“管大用”。

毛泽东从不写“无病呻吟”的文章，从不写拘泥小事的文章。他写文章，目的是为了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文章才能够立意高远。立意高远，是毛泽东写文章最根本的特点，是他最重要的写作风格。立意高远，不仅使他的文章“管大用”，而且是他的文章恢弘致远、大气磅礴的基础。

独特的文笔特色

据蒋介石身边人员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评战犯求和》《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时，虽然没有署名毛泽东，但蒋介石从收音机里一听到这些文章，就断定是毛泽东所写。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炮击金门之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虽然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

义发表的，但蒋介石从收音机里一听到，就知道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写的文章，有自己的文笔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写作文章，在他立意高远这个最重要的写作风格基础上，形成的文笔特色，大体可以概括为：“大气磅礴”、“论理透彻”、“生动活泼”三句话。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会感到一种大气。毛泽东写文章，总是在胸怀大局、眼光高远基础上，形成一种宏大的气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立意在于充分估计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农民的各个阶层，宣传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反驳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微词。写作这样的“大文章”必然体现出一种“大气”。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开头一段中写有这样的话：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

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文章中的这些话保持了毛泽东青年时代激越的文字风格，在大气磅礴中显现出他论理的功力。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是从分析中国大局起笔，又是从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论及一国之内在四面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这种“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文章主题即是如此大气。毛泽东文章中的这种大气，不仅仅限于他确立写作目的和主题方面，也体现在他的文笔中。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处写有这样的话：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

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这些文字中，充满了何等的磅礴大气。毛泽东就此止笔，益发显示出他信念的坚定不移。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有这样的话：

在站起来的四万万中国人民面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就吓它一大跳，这头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在日寇侵略气焰嚣张之时，毛泽东在文章中写下这样的大气磅礴的话语，怎么不令人鼓舞和振奋？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已经掌握了原子弹的世界强国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强大军事力量，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了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面对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毛泽东却轻蔑地称之为“纸老虎”，并且从世界历史角度谈到：美国和它所支持的蒋介石，和历史上许多看似强大最后却被人民所消灭的反动派一样，摆脱不了被消灭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 1949 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致词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段话语气之宏大，气势之恢弘，从古至今，能有几人能比？

1955 年，毛泽东在同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谈话中再次谈到原子弹，但在毛泽东眼里，原子弹是那样的渺小：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在这里，毛泽东的眼界覆盖整个地球，直达太阳系，从

如此阔大角度看待原子弹，谁能做到？可见毛泽东的大气。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章：“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这个话客观地反映了毛泽东文章的大气磅礴。

论理透彻，是毛泽东的文章风格之一。他的文章，分析问题总是层层深入，说理明白，引人爱读，让人信服。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理论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分析清晰，论理透彻。仅从《矛盾论》中即可看到毛泽东论理的透彻，他从两种宇宙观谈起，步步递进，谈到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最后得出结论：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

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闪耀着光辉，首先是其理论的力量，而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力量，就体现在他文章论理透彻之中。理论的力量加上文采的魅力，使毛泽东成为古今中外真正的文章大家。

生动活泼，是毛泽东又一个重要文笔特色。毛泽东的文章妙语连珠，故事叠现，用典精辟，比喻恰当，讽刺深刻，举例鲜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的话：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在农民革命中各种鲜活形象。

善于使用讽刺文字是使毛泽东文章增色的重要因素。在《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一文中，毛泽东讽刺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

毛泽东的这个讽刺，是多么生动，又是多么鞭辟入里。对党内不良倾向毛泽东也在文章中讽刺。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讽刺教条主义者：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

“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毛泽东对于党内不良倾向的讽刺，不同于对敌人的讽刺，他的道理是：“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恰当的比喻，使毛泽东文章十分生动。他曾把长征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豪迈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一直到老年，毛泽东写文章，以及在讲话基础上形成文稿，都保持善于比喻的特点。他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

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毛泽东这段话，正确地论述了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的对立统一，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变革和稳定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是我们今天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改革论述的一把钥匙。

毛泽东的文章所以生动活泼，旁征博引，善于用典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他在写文章时，善于随时自然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文章中去说理论事，使他的文章有极大的说服力。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引用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此典说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说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以此典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1939年7月毛泽东给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时引用了《封神演义》中的典故：“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

三样法宝。”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引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种比兴手法，促使人们牢记三大法宝。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弔。”用此典形容司徒雷登孤立、无奈的样子，接着又讽刺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借《红楼梦》里林黛玉“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的话，说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道理，使严肃的话题显得开阔、轻松。

生动活泼，轻松有趣的文笔，使毛泽东文章的阅读者，总能感觉到一种清新之气。

（来源：《世纪风采》）

从毛主席《给胡乔木的信》学公文写作

1957年12月25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专门谈“除四害”通知的写法。这封言约旨远的信指明了从事公文写作应注意的环节、内容和形式等问题。今天读来，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须下调查研究的功夫

毛泽东同志审阅胡乔木写的通知初稿，感觉“不扎实，轻飘一些”，指出原因是“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可见，不了解工作的实际情况，写出的公文针对性和指导性就不够。公文的起草者应当先通过学习研究，弄懂弄通公文所涉的相关工作，力争成为这方面工作的专家。

在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还专门指明了改进公文写作的办法。他让胡乔木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报纸刊发的各地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修改三五遍后，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可见，写好公文并非易事，不仅需要通过广泛阅读和调研形成认识，还需要通过多种渠道集思广益，以工作实际和科学规律为标尺，避免闭门造车，将调查研究的功夫下到实处。

须下系统设计的功夫

每一项工作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系统工程，起草公文时，不把这个系统工程的各个环节理清楚、说明白，写出来的公文难免会有违初衷。非系统思维不可立灼见，质量高的公文都需要有理论、有办法、有要求，需要想清楚“为什么干”“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再落笔。

以“除四害通知”为例，有理论，即把“为什么干”写透。“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就是要让干部和群众明白，“除四害”不仅对于消灭各种疾病有直接关系，还是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大举措。

有办法，即把“怎么干”写透。“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就是要让干部和群众看了就明白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从何处做起。

有要求，即把“谁来干”“干什么”写透。如“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就是落实责任、明确步骤、检查督导，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

须下语言文字的功夫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公文不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而应讲求实效、易于传达。在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公文写作要“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同志曾专门指出，文件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概念、判断和推理属于准确性的范畴，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则除了逻辑问题，还有词章问题。看那些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性、不讲求词章的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提法准确、层

次清楚、逻辑严密等，大体不出以上范围。

逻辑清楚，保证文章表意明晰、传达准确，需以系统思维贯穿写作全程，而“文字兴致勃勃”则是更高的要求，是通向精品文章的必由之路。如何打磨文字，通过清新的文风和恰当的修辞，使得文字不仅简明扼要，而且呈现一种生动活泼、兴致勃勃的气象，让人看得进去、干得明白，应该成为我们从事公文写作“心向往之”的工作追求。

（来源：《秘书工作》 作者：孙明）

向周总理学审改公文

周恩来对事业高度负责，对工作严谨细致，在审阅和处理公文时倾情投入，一丝不苟，认真推敲每个字每句话，同时还亲自核算每个数字每个百分比，检验其是否准确可靠，不差分毫。

周恩来总理生前日理万机，鞠躬尽瘁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与此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始终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坚持不渝，认真细致地审改公文、处理公文。

周恩来审改公文的原则和方法，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学习和继承它们，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提高审阅、修改

和运用公文的能力与水平。

把握原则明确政策

公文是党政机关行使职能的重要工具。对上级机关而言，要通过公文向下级机关就某项或某时期的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工作方针、具体要求和相关政策等，以指导和推进工作。因此，公文必须主题鲜明，内容正确，具有操作性。周恩来审改公文的时候，特别注重思想内容，对于理论、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反复斟酌，慎之又慎，以确保其鲜明、正确、管用。

从 1953 年开始，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全国广泛实行普选人民代表，着手建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总理办公室负责中南海选区的选举工作。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办公室负责人每天上报有关情况，根据反映的问题，随时作出批示，提出解决办法和要求。针对选民登记表不是本人填写的问题，周恩来批示：“我的登记表应给我重填。”又批示：“代填选民登记表本身就是错误，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续上的错误，主要的要进行本人登记。”他还在“进行本人登记”六个字下画了六个圆圈，强调其重要性。在周恩来看来，选民进行本人登记事关人民代表选举的原则性、严肃性，不允许越俎代庖。按照总理的要求，负责选举工作的同志及

时纠正了不当做法，圆满地完成了选举工作。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下发。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决定精减城镇人口2000万。这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涉及政策的工作。周恩来为此废寝忘食，煞费苦心。该决定出台前的文件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其各得其所。”周恩来审阅时，在这段话前面加上了“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明确和强调了领导机关应负的重要责任。文件稿关于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比较原则，周恩来专门加写了一段操作性很强的话语：“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能够逐步习惯于新的生活。对于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专区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时期内，将发一定比例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以维持其生活。县和县以下的各单位裁减下来的职工，不实行这种办法，而采用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金，并带一定数量粮票的办法，以便及时下乡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处理。”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来的修改稿下发的。在国家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为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1973年1月，外贸部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提出在对外贸易中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这一提法，不符合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平等互利重要原则。周恩来审阅请示报告时，用笔勾掉了“以我为主”四个字，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主席，他圈阅“同意”。从此，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明确了不能搞“以我为主”的错误做法。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高瞻远瞩，视野开阔，善于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牢牢把握大局，处处坚持原则，事事讲究政策。这一点，在他审改公文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确保数字精准无误

公文是官方文书，行文中会有一些数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它们同文字一样重要，必须精确无误。否则，不仅会造成笑话，还会影响决策，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周恩来对事业高度负责，对工作严谨细致，在审阅和处理公文时倾情投入，一丝不苟，认真推敲每个字每句话，同时还亲自核算每个数字每个百分比，检验其是否准确可靠，不差分毫。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向苏联方面征询意

见，并争取苏联的援助。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件稿，发现其中一组数字错了。于是，他找来代表团中起草文件的两位同志，严肃地问：“你们说说，49 加 3 等于多少？”两位同志立即查找原因，最终发现，他们在统计数字的时候重复计算了一个人头，正确的数字应该是 52，而不是 53。周恩来批评这两位同志说：“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

1961 年 3 月，周恩来与粮食部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周恩来亲自排出表格，相加数字，结果出现了 5000 万斤的差数。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他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还是无法平衡。周恩来思考了片刻，然后询问粮食部负责同志：“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 5000 万斤，加了没有？”经总理提醒，粮食部负责同志猛地想起，是他们漏记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当即向总理作了深刻检讨。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认真细致地审阅每一张粮食报表和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每一个数字，周密安排和调拨粮食。据统计，在保存的当年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 32 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共计有 994 处，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数字核算。它们生动地记录了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

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智慧与心血。

周恩来为什么如此重视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在周恩来看来，具体数字是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重要依据，它们既关乎国计民生，也关乎决策成败，所以，要确保数字精准，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严格规范公文程序

公文与其他文体不同，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遵循其严格、规范的程序，有助于维护党政机关的权威，保证公文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周恩来是我们党讲规矩的楷模，他时时讲规矩、处处作表率。在审阅和处理公文的过程中，他随时改正不准确之处，使其符合严格、规范的程序，以维护公文的权威性、严肃性。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27个单位负责人的任命。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工作都在起步阶段，政府的公文也不够规范，提交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命名单》中没有标明“××××第×次会议通过”的字样和各单位顺序号。该任命正式发布之前，周恩来在审阅文稿中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他在“各项任命名单”题目下加注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字样，并从“一”、“二”、“三”……一

直到“二十七”，在每个单位前加上了顺序号。每次审阅公文发现疏漏或不规范的地方，周恩来都会及时加上或改正纠正过来。他有时还在文件上批示，要求有关同志注意改正错误。

1950年3月，全国总工会向政务院报送中国搬运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的建议；劳动部同时报送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草案。3月31日，政务院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了以上两个文件，并作出决定。政务院在关于这两个文件的决定草案中写道：“批准”中国搬运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关于……的建议，并“通过”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即予公布施行。周恩来在审批文件的时候，作了两处修改：一是把“批准”改为“接受”，二是把“通过”改为“批准”。因为，全国总工会是人民团体，不是政务院所属部门，它向政务院提出的建议，政务院不能“批准”或“不批准”，只可“接受”或“不接受”；劳动部则是政务院所属部门，政务院对它提出的报告、请示，只能是“批准”或“不批准”，不该是“通过”。周恩来的修改，不但文字表达准确，而且更符合政务院同全国总工会、同劳动部的关系。

周恩来审改公文，要求严格，注重规范，精益求精。他

既审查主题、内容、字句、数字，也注意标点符号、文件格式，包括文件中的附注。凡是经过他审核或批发的文件，无一不更加准确、规范，具有权威性、指导性。

（摘自：《刊授党校》 作者：杨诗）

胡乔木怎样写公文

人物小传：胡乔木，江苏盐城人，1912年6月出生，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宣传部副部长、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的卓越领导人。本文是胡乔木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在写文件方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央要我来讲一下写文件里面的一些问题，怎样能够实现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提出的要求。先声明我讲不好，只是提些意见，作为参考资料。写文件和做工作差不多，叫个人来谈怎样把工作做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文章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里面道理很多，我知道得有限。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我想谈四个问题：

- 1、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识；

- 2、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
- 3、看条件：什么样文章，给什么人看，要求不同；
- 4、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地达到目的。

现在分别谈一下：

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除三十条专门讲这个问题外，还有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六条、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七条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三十二条是说“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三十三条是说“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三十六条是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方法，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四十二条、四十二条是说学点文学、文法和逻辑。四十七条是说要培养“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这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人，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各部门工作条件不一样，各部门对自己的业务比较熟悉，党和群众对这些就不那么熟悉。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和

群众作宣传，使他了解，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就要讲究方法，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

一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开头引人看，还要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二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道理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要使人相信，要说服党和人民群众。我们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写文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懂你不懂，就有了矛盾，就要处理，就要用道理说服人，不但说服人，还要能打动人，说服着重在理智方面，打动人除了理智方面还带有一点感情，使看的人真正被你动员起来。

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点要求，写了人家不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文章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和群众

的目的。我们做工作希望得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但文章党委没有看，或者看了没有懂，党委就不能了解和赞助，群众就动员不起来，这样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就会陷于孤立的状态。孤立无援，得不到党和群众的支持，就会犯错误，即使工作方针意见是正确的，也会犯错误，因为你脱离了党和群众。写文章一定要讲究方法，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这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主席这次的“六十条”才提出的，很早以前就再三提出过。例如毛主席一九四二年二月写的《反对党八股》就深刻地论述过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离现在已有十六年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曾发出“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这个文件也是经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以后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又几次提到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看重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让党早下决心，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地去。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认真注意，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无论马、恩、列、斯，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二、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工作方法六十

条”中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问题恐怕讲不好，我现在只能说一下对这个问题部分的想法。

（一）准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六十条”中的三十七条已有了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上的三个名词。概念相当于词，判断相当于句，推理相当于两个以上的句子，如茶壶是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容易明了，容易准确，还有抽象的概念，如“多快好省”、“反冒进”就比较复杂，比较抽象。名词固然可作概念，形容词也可变为概念，转为名词，概念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多快好省”是事物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概念是不是明确，要看我们说的话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观的东西，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几个概念，代表的范围大小不同，这里指这个，那里指那个，完全不同或者部分不同。人的思想的基本的工具是概念，如基本建设离不了几样材料——概念就是基本的材料，无非是木材、钢材、水泥，一句话无非是概念组成的术语，肯定或否定，好或不好。“高速度”，究竟怎样才算高速度，是对什么东西说的，离开了一定的范围说高速度就不明确。

判断，有了几个概念就可以作判断，如茶壶需要大量生

产，大量生产就是概念，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再如每县搞发电厂，这就是个判断，县是抽象的，不一定代表哪个县，可以代表通县，也可以代表别的县，通县也还是个概念，搞发电厂也是个概念，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对什么不对，这就是判断。判断对不对，就要看先后次序对不对，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可能。

推理就是从这一句话引导到那一句话，由第一句话引到第二句话，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的关系就是推理，有时两句话没有推理关系，但很多时候有推理关系，就譬如“六十条”中的三十七条所说的这一段话：“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这就是推理。紧接着又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这也是推理，既然是大灾难，当然就要改变。下面是“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这也是推理，下面是“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这也是推理，这里面有许多论证省略了，因为完全可以看懂，所以省略了。如要说得完全，大致是：既然这么重要，大老爷就用

得着管，既然大老爷用得着管，无非是说二把手三把手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问题不能完全熟悉，或者如果仅仅委托二把手三把手来搞，自己不来讲究这个问题，不来注意这个问题，自己的思想也就不能清楚……等等的意思。

关于准确性的问题，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准确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判断推理对不对，个别的简单的事情也有判断，看字句对不对，数目字是不是有错，再来肯定或否定，或者是看推理对不对，这是形式逻辑里面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问题，我们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书，有苏联人写的，也有中国人写的。比较薄的本子还不太难看，可以找来看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看总比不看好。

还有一方面是比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涉及根本立场、方针、方法。涉及简单的问题是形式逻辑，涉及到复杂的问题，就涉及到马克思的理论，涉及到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等等。因为“六十条”在这个地方讲准确性，比较着重谈写文件，所以没有着重谈事物的主流、支流，没有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着重谈对大量事物的本质如何分析，因为别的地方已经讲得很多了。

搞文件，首先要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如果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即使有个别的判断推理是正确的，

也不能挽救这一篇文章，使其由错误的变成正确的。这是要注意的根本性的问题。方法首先要分析正面反面，挑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矛盾的两个主要的侧面，是根本的方法。至于每句话的判断、推理的关系，也是逻辑，属于形式逻辑。总之，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并用。

（二）关于鲜明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1、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写文件与写小说剧本不同，鲜明性的要求不同，关键是观点要突出。写文章无论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观点是个判断，是推理来的，推理是从材料来的。所以，要鲜明首先要看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如果观点和材料不统一，就像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三十二条中说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写文章用材料是为了说明观点，文章写出来叫人家看不清楚，就是不鲜明，就是材料和观点没有联系好，每个观点应该接着有事实作证明，不能证明观点的事实就不要用。每个论点有论据，这是推理问题，从鲜明性来说，观点和论据要摆得合适。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有

设计。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观点和材料隔绝了，就像工厂的车间和原料离得很远，甚至中间隔了一道墙一样。如果说有些文章材料、观点互不联系，也是冤枉，他自己可能以为材料和观点联系了，但是离得太远了，太罗嗦了，或者不清楚，材料就不能说明观点。观点和材料，结论和论据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事实和观点要安排好，一段话要说明一个观点，要有相当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这段话就鲜明，看起来就干净。如果一段话只有很多观点，或者事实很多，没有观点，看了以后就迷失方向，不知道要作什么。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首要的关键。

主席提出两个文件，一是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一是广西的报告。如少奇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为什么看起来很清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有事实作证据，事实也是为了说明几个观点。一个是说红薯好吃，有事实。一个是说红薯是高产作物，对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大有帮助。现在有什么问题？河北省需要向外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是河北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向全国推广，难于调运和保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夹叙夹议，做到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材料和观点要统一不难作到，只要有意识地注意就不难。人的观点不

论正确的不正确的都是事实的反映。写文章无非是为了说明观点，要使人相信这个观点，就要讲些事实，不管这些事实讲得是否周到、全面、正确。一个观点正是从事实中来的，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所以说，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不难作到。

2、只作到材料和观点统一还不够，观点还要突出，不突出即不能鲜明。街上马路旁边有很多广告，我们首先看到的广告总是突出的，或者是因为它特别大，地位突出，或者因为它色彩鲜明，或者用的画引人注目，等等。一篇文章总的要求，要解决什么问题。毛主席常讲，一个政治家要善于打起旗帜。旗帜就是个纲领，要有鲜明的纲领。旗帜很高，面很大，色彩很鲜明，一下子把群众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常讲在马列主义旗帜下，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在和平旗帜下等。一篇文章有个基本观点，总的要求，它在文章中就要像一面旗帜一样，主要观点鲜明，提得突出。如果你的论点想拿出来，又不想拿出来，吞吞吐吐，文章就不会鲜明。

有总纲还要有目，纲是提起网来的那根总绳，网还有许多眼，有句成语，“纲举目张”。一篇文章要鲜明就要作到纲举目张。整篇文章、旗帜拿出来了，有大的论点还有小的论点，大小论点要互相联系，排列要醒目，这很要紧。哪些是纲，哪些是目，目与目之间的排列，层次要清楚，条理要清晰。比如，一个大问题下面有三个小题目，为什么这个小题

目摆在第一，那个摆在第二、第三，道理要很清楚。并且，段落要分明，我们现在常有的毛病是一段话写得太长，观点太多，看起来不清楚，即便清楚看起来也容易疲劳。一篇文章分为好多段，这是节省看文件人的脑力的好办法。看完一段知道这是个小结，是一个观点，下面又是一个观点，帮助人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一段最好说一个思想，如果一两个小问题统一起来还只是一个思想也可以。一篇文章是个大的思想观点，每一段是个小的思想观点，要尽量避免把两个互不统一的观点放在一个段落里。并且段落与段落之间前后要能贯穿，这就像基本建设设计一样，有个布局，这个车间与那个车间，厂长办公室，道路的布局要很清楚。全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大纲小目的关系准确，段落分明，前后能贯穿，这些都是帮助观点突出的办法。

我们提出问题，要有背景来证明观点，证明观点的事实材料也要有背景。不要脱离背景，要注意背景。黑字写在白纸上，白纸即是背景，能比较才可看得清楚，黑字写在黑纸上、白字写在白纸上就都看不清楚。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背景中去了解，孤立地提出一个论点，提出一个事实，看的人就不会了解。毛主席说，香花是和毒草对照的，真、善、美是和假、恶、丑对照的。我们提出一个指标，看一个工厂的生产怎样，没有背

景，速度的快慢就看不清楚，背景就是把现在和过去、将来比较。只有将现在和过去、将来比较（纵的比较），这个部与那个部、这个省与那个省，中国和外国比较（横的比较），才能看出问题来，看出是落后还是先进，这就是提出了矛盾。任何事情都有这样一个问题，正面的意见要有反面的意见衬托，便于考虑有哪些反对意见，为什么是不正确的。有时我们写文章，话都说了，可是人家看不懂，为什么呢？常常就是因为没有背景，没有衬托，没有比较。观点要有背景，事实也要有背景，现在的表格比较注意了，有绝对数，还有相对数，还有百分比，就容易比较，看起来比较明白。表格搞起来比较容易，数目字大家也记不了那么多。写文章也应该像列表格一样，要有相当的背景，文章的背景当然不能像表格那样公式化、千篇一律，要看什么事，给什么背景。说明事实的重要，单是本身事实不能说明，要说这件事做了帮助了什么，不做妨碍了什么，这也是背景。从前，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介绍了一种方法，叫古今中外法，当然不是什么都讲古今中外，有横的比较，有纵的比较，可以放在古今历史背景上看，放在中外世界背景上看，和古比不一定几千年前，和去年比也是古，和中外比不一定和外国比，这个部和那个部、这个厂和那个厂也是比较。除此，相关的、相反的方面联系起来讲，从纵的方面、横的方面比较，也可以使观点突

出。要把观点突出，要鲜明，除了要有布局、有背景外，还要有辩论。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文章中讲了好多。提出一个问题，无非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赞成要讲出充分的理由，对反对的意见要加以反驳，有个针锋相对的比较就容易鲜明。要反驳就要讲很多道理，道理要使人信服，理由要充足。还要有比较尖锐的形式，注意适当的尖锐形式和加强语气，这样可以使观点突出。如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中说：“我认为中央应当告诉粮食部，对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一个统一的安排”。前面讲红薯如何……，如果没有辩论还不那么鲜明，下面就有辩论。“过去粮食部的同志说，红薯难于调运和保存，不能制面，这些意见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这几句话里可看出有了辩论而且加强了语气。

为使观点突出，还要注意文字形式上的问题。一是标题。有的可以不要标题，向中央的报告，可以不要标题，因为不需要那么鼓动，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就行了。向群众宣传、发表文章，标题就很重要。毛主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不讲究标题。任何文章都要讲究标题，好文章没有好标题不行，报纸上那么多文章，谁知哪篇好，当然要先看标题，标题好的就吸引住人、引起人的兴趣。有时一篇文章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标题，人民日报有篇元旦社论，内容大家不一定记得了，

但是都知道是“乘风破浪”。可见标题很重要。其次是导语，导语是报纸上用的，逻辑讲叫作论题，导语和论题都应放在文章的前面。叙述一件事情，讲个道理，要将要点放在前面，讲个道理要把结论放在前面，不是按照三段论式，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而是先结论，然后前提。叙述不是先怎样、后怎样、最后怎样，而是最后怎样，再事前怎样。当然写小说不能把结论放在前面，那样就没人看了。我们大家都在工作，不同于看小说，大家都很忙，要解决问题。毛主席常讲一个故事，在北京有一位叫邵飘萍的记者，讲新闻学的导语，给他印象很深。如写一个某处失火的消息，说某天下午有个老太婆生火做饭不小心，街上出了事出去了，没当心，火花跑出来，过了一小时烧了起来，半小时后救火队来了，最后才知道损失了多少。如果没有导语，这个新闻就要这样写，如果有导语，应当先说：哪天哪条街失了火，损失多大，烧了多少房子，死了多少人，这是人们最注意的，至于那个老太婆姓张、姓李，如何烧起来的等等，不是人们注意的，要寻根究底再往下看。红楼梦有一章回目是：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先要信口开河，也才好寻根究底。我们要把要点、结论放在前面，当然不是所有文章都适合这样，但大多数需要这样作，否则就不突出。先提出结论然后再围绕结论展开讨论，这就叫做醒目。可以叫做倒悬，就是

叫人紧张。写文章要叫人紧张，结论放在前面，论据放在后面，这就是倒悬的姿势，就会引人注意。写文章要把结果放在最前面，把压轴戏放在前面，不像写小说，也不像演戏，我们是办事情，要开门见山。还有，末了的结论还要收得好。总之，标题、文章的开头，每一段的开头很重要。

（三）关于生动性。写小说容易生动，也可以写得不生动。写文件要生动，不生动人家不愿意看，但不能像普通文学作品那样办。要生动就是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可以增加生动性。纯粹抽象的，像算术题似的，一道道列下去，怎样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是抽象的。我们讨论工作本来是比较抽象的东西，讲的道理、列举的数目字是抽象的，可以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可以不那么沉闷。如报纸上发表的湖北省委关于红安县委搞试验田的经验的报告，也可以换另一种写法，光报告搞试验田，道理虽然也可以讲清楚，但不生动，湖北的报告中加些具体的事情，就很生动了。乡里人到县里要见干部，干部开始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以后城里干部下乡，乡里人也说，“没有时间”。等了一会，他也说，“我下班了”！引了这么件事就大为生动。还提到干部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社员骂了他一顿，说“摇摇摆摆像个相公，莫把田埂子踩塌了”！单这句

话还不够，又问：“你骂谁？”社员说：“我骂你！”然后再加上县委副书记说：“骂得对！”有这样的对话，印象就很深刻。这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选得好，话也很生动。典型选得好，一穿插就很生动。单讲道理，报告就减色，动员时作用也就没有这么大。加些具体事实，并且要具体到形象化的程度。广西省委一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央的批语写道：“广西省委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情况交代得清楚，道理说得明白而正确，文字生动而简练，使人看了还想再看。望各地各部门学习用这样的方法来写经验总结报告。”这个批语是少奇同志写的，送主席，主席又加了一句：“我们希望有成百万的干部看到这篇好文章。”为什么这是篇好文章，看了还想再看？就是他引了很多农民和干部的话，而且引的这些话很生动。如果去掉这些话就不会那么生动。

文章尽管是讨论工作，但应该有感情，提倡什么、促进什么要有感情，反对什么，也要有感情，当然不是专门发挥感情，感情用事，但显不出一丝感情来也不好。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的批示，原来拟的稿子只是一般的写了一下，说这个报告很好，发给各地参照等，受到主席尖锐的批评，说是党八股，没有一点感情，是官样文章，不痛不痒。如果一篇文章较长，没有点问号和感叹号，就会枯燥一些，感情的变化就不大，就不大生动。最后，文字上

要讲究些修辞，话要通俗，难懂的话要少用，非用不可时要加以解释。

文章要有些情绪，如正反面对照，引用两句古话，增加些色彩，格式有些变化，要有些曲折、波澜。让文章生动只有这些方法不够，但注意了这些，就比较会使文章写得生动一些。

三、关于条件。刚才所说的这些，不见得正确，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这样办，还要看对象。对象分两方面，一是给什么人看，二是写什么题目。还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有个例子，在南宁会议的时候，王鹤寿同志写了发展钢铁工业的材料，然后十八个部门同样写了发展计划，有表格、数字、说明，鹤寿同志写的比其他部门不见得更生动、鲜明，差不多，就是因为对象不同，条件不同。钢铁工业中央很注意，早就酝酿，已谈过多次，对这个问题相当熟悉，细节中央已经知道了，只是全貌还不大了解，鹤寿同志的文件有全貌，有背景，有同外国比较，有大、中、小比较就够了。其他题目，过去中央没有怎么讨论和研究，因此，从一个表上的确不易看懂。这里同时也说明一般看表格是比较困难的，写报告要多用些文字，少用些表格。有的报告的内容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形象，如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铁路怎么发展，要搞那么多形象化就不好办，不是长篇报告，引具体人，讲什么话

也困难，所以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得像湖北、广西的报告那样。但如何叫人看起来有兴趣，能够看完、看懂，方法还是可以捉摸的。文章写得长，写得短，写得详细，写得简单，要加解释，不要加解释，要看人家了解的程度。什么文字要多加工，什么可以少加工，要看对象。如人代大会上的报告一般要少用难懂的话，人家提出来还得解释。从前有一句诗写杨贵妃的姐姐“虢（guo）国夫人”是“淡扫蛾眉朝至尊”。因为唐明皇很宠幸她，她们常来常往，就可以这样。什么可以“淡扫蛾眉”，什么要多作梳妆打扮，要看对象。我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看，给什么人看，要使人看下去，应该捉摸一下，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文章的话是对群众讲的，对这部分群众还是对那部分群众，是给干部讲的，是给中央写的，文章应该不同。

四、怎么办？中央对各部写文件提出了许多要求，今后应当如何改进？我看也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六十条”提出要培养秀才，要搞个计划，定下人来，定下时间。计划看些什么，加以讨论，把过去写的文件，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讨论一下，党组书记主持开会不能多，但可开几次，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找几个人成立个小组，订个计划，一年讨论几次，中央经常提出一些写得好的文章，也批评一些写得坏的文章，自己写过的文件也可拿来讨论、

比较，研究典型。“六十条”提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好的典型很多，毛主席写了很多文章、电报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典型。我们抓住写得好的和不好的两头，就可以带动中间。主要讨论两种典型。也可以参考一些书。“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已提出，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有些文法和逻辑书，能认真看最好，如果没有兴趣，也的确比较枯燥，看不太懂，浏览一下也可以，看一遍有个印象也有好处。还是以讨论两种典型为主，参考书为辅，组织个小组，一年认真讨论几次。大家都写文章，部长写，司局长也写，可以分开几个组，也可以有大组小组，如果一年能检查四次，我看大有希望，世界不是不可知的，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改变的，写文章是客观实践的过程，它的内在规律是可以掌握的。至于是否能运用自如，那是另外的问题。只要加强领导、订出规划，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可以实现的。

（来源：（《胡乔木文集》）

胡乔木的文章写作“经”

胡乔木是我们党内的文章大家，一生撰写、整理、修改的文件、讲话、社论不计其数。他的文章写作之道对我们提

高写作水平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文风要鲜活，写文章得“量体裁衣”。胡乔木认为文风与写作水平及效果密切相关。他曾说：新的文风，应当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别人的好文章，必须读，必须研究它的结构，但任何好的结构都不能硬拿来自己用。自己的结构，应看每次是说什么话，对谁说话而有所不同。最好的裁缝师，不是用衣的样式硬套在人的身上，而是根据人的身材，决定衣的样式。写文章也一样。不公式化，就可少点“八股”气。这是使文章写得新鲜活泼的一个重要条件。

文章不要过长，愈长看的人愈少。上世纪 40 年代初，胡乔木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短些，再短些！》的文章，倡导写短新闻、短通讯。他说：话说得短，说得简要对我们沾了“长风”的不是易事。他向《解放日报》提议，文章要缩短篇幅，还解释说，这对读者作者都有大好处，多数作者也是爱写短的，写得愈长看的人就愈少。

胡乔木分管《人民日报》期间，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分析为什么有些报纸版面不生动时，他说：主要是新闻条数太少，长新闻长文章像是几个大胖子挤在一张床上，他们的姿势摆得再美也不会好看。报纸版面要想编排得生动，首先不要让大胖子上版。

文章要生动，文字得“波澜起伏”。胡乔木很注重文章

的生动性。他在指导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曾说：文字要有波澜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就很难吸引人读。一段或几段开头，要有很精彩的话把事情提纲挈领地提出来。他在指导编辑记者写评论时也多次提出文章要生动。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要反复推敲修改，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胡乔木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胡乔木写文章可以说很少有真正的定稿，反复修改是他写文章的一大特点。他的文章不管转载多少次，每次都有新改动。

胡乔木改文章，堪称一绝。从选题到立论，从标题到全篇，从理论到政策，从观点到材料，从布局谋篇到层次结构，从引语数字到标点符号，经过他的细心掂量和推敲，举凡有什么毛病、偏差和欠缺，都难逃过他的眼睛。他对文稿的每一个概念、判断和推理，每一个表述和提法，都力求准确、恰当、贴切、得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合乎分寸，合乎政策意图。因此，一篇文章经胡乔木一改，哪怕是改几句话，

加几句话，甚至只是改几个字，就大为改观。看稿时胡乔木心中似乎有一把精密度很高的尺子，一篇文稿用我们的尺子衡量还满不错的，用他的尺子衡量就不合格了，甚至基本上不能用。《人民日报》编辑送他审阅的稿子，一般都用八开新闻纸，在当中排印三栏长的文字，周围留有很大的空白。经他改后的稿子，往往布满密密麻麻的清秀的钢笔小楷，而原稿的文字有时候几乎“全军覆没”。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总理才如此评价胡乔木：“许多文件只有经过胡乔木看过，才放心发下去。文件经过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来源：《秘书工作》 作者：邵恒春）

朱维群有关公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在我们工作中，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载体，而这个基本载体现在毛病不少。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时，曾经批评当时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文风比那个时候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一些问题比那时候还严重。有些文件、文章拿过来，想找些有针对性的话、有用的话，很难。人们往往不是从前往后看，而是从倒数第二段或第三段开始看，因为往往讲到这里才是讲问题的，而前面占了主要篇幅的大多

是些大而无当、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举一个例子，现在下级评价上级的讲话，无论是评价总书记的讲话，还是评价某个支部书记的讲话，一律“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高屋建瓴，有很强的现实性、政策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什么叫“高屋建瓴”？我估计许多经常用这个词的同志自己也不清楚。

文风实际上是思想作风，是党风在文字工作中的体现。如果文风没有活力了，实际上是党思考问题的水平、方法出了问题，党的活力在丧失。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党内整风，整风当中又把反对党八股作为重要问题提出，为什么？如他指出，是因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藏身的地方。我们现在的文风，实际上也给党内各种消极现象、不作为现象一个防空洞。比如我们现在几乎每篇讲话、文章都要强调抓落实，一般说“抓落实”已经不够了，还要“切实抓落实”，还要“切切实实抓落实”，已经到了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地步了！为什么还不能落实？原因之一是这个文风就是虚夸之风，就是不利于落实的。“切实”太多，本身就说明你没有信心落实。我们统战工作的职能，决定了我们既要研究理论、政策，也要承担大量实务。无论是“务虚”还是“务实”，都是为了帮助中央处理现实重大问题。所以要特别倡导实实在在的文风，而不要把那些虚头巴

脑的东西搞到我们的文字工作中来。

我们所要求的文风、文字是什么样的？

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为实际工作服务。

各种不同文体对文字有不同要求。诗歌要合辙押韵，读起来好听；小说要见人见景，栩栩如生。而我们中央职能部门的文字——大家回家以后写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应该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推动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完成，而不是为了抒发文采，展示作者才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字必须反映实际，以解决问题为要旨，避免坐而论道，避免把时间精力弄到概念、词句、提法的新奇上，文章架构的工整上。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词好句子涌出来，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离开实际工作的需要，专门在概念、词句、提法的出新上打转，那就会贻误工作。如果作者才情泉涌，涌得太厉害无法克制了，建议到文艺刊物发表，而不要涌到党的文件上来。可以写诗填词嘛，你越工整、越对仗，平平仄仄都搞上，那才是高水平，但这不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毛泽东是文字大家，他的诗词的风采，很难有人企及。但是他在讲工作的时候，文字是非常朴实简明的。中国古代对文章功能的理解是“文以载道”。“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朴实的，因此载道的文字也应该是朴实的。我在李瑞环同志那儿工作过，他曾送给我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

事诚平恒。是他练字的时候写的，我感觉非常好，他就加上题款送给我一张。在他看来，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简、浅、显。我理解，就是不要故意把问题在表述上搞得过于复杂、玄虚。问题本身可能是复杂的，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一定要让人易于懂，易于明白。

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还文笔以自由。

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时候，我们机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越来越讲究排比、对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领导讲话、权威报刊的理论文章，文内第一层次标题不管相隔多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语式甚至到字数都是对应的；然后第二层次标题换个排列方式，又都是对应的；如果有三层、四层标题，仍然是对应的，规规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学生造句作业。至今一种常见写法，XX是目标、XX是任务、XX是窗口、XX是桥梁、XX是纽带……下了一番苦功，但透着一股陈腐气息。这种写法，不是以内容的需要来摆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来裁剪内容，合之则留，不合则去，结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观点得不到阐述，统统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这种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词句框架，很难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你们去找找看，四六句儿、工整对仗，一层标题二层标题三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没找到。毛

泽东多少还讲点儿文字的风采，邓小平连这个都不讲，干脆就是直说，“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拿最土的话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说他没有文采，简朴、明快、透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文字工作要为实际斗争服务的一种精神的体现。我们要的文采是这种文采，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过分雕琢的文采。

我们文学史上有一种骈体文，两汉、魏晋下来，多少人写了多少骈体文，辞藻华丽得不得了，人们能记下的大概只有“滕王阁序”，因为它做到文字和内容高度配合，其他如著名的“三都赋”，搞得洛阳纸贵也没有多少人记住。这种骈体文的特点倒是被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继承了，可惜玩文字又玩不过古人。毛泽东也有过工整、对仗、排比，在《反对党八股》里。他说：“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第一条叫做“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四个字儿一句，两句八个字，继续工整下去，第二条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然后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最后一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工整对仗排比，无以复加。但毛泽东是提倡这个吗？他是最看不上这个的。我并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用用排比、对仗，讲究讲究工整，都是多余的。我

是不赞成我们的年轻同志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到这个方面去，不愿意这种风气成为我们的一个导向。

第三，文章尽可能短一点。

文章要短一点，大家都知道。那么怎么才能短？我在改稿实践中发现几个具体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是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如果一个意思决不说两遍，自然就短了。开会讲话中难免要表示感谢，经常是谢了一次不行，隔几页还谢第二次，甚至谢三四次，你把感谢的话放到头里一起说完了，后面就不要再感谢了。讲形势的分析，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个段落；讲工作部署，所有部署全放到一个段落。我现在替大家改稿子经常不是为了修改思想，思想都非常正确，功夫就花在把“同类项”搞到一起。再比如，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是鲁迅的话，从小老师就教过我们。但实际上我们文字中，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落太多了。我们为什么文字越弄越长呢？除了大家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丰富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书写方式越来越便捷。古人最早在丝帛上写，丝帛贵呀，他必须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还有竹简，用竹简很费劲，要把竹简削出来，还要防腐，肯定他要尽可能地省略字句。古人讲“学富五车”，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车书，谁也读不完，但是古人能读完，因为他用的竹简，五个牛车也

拉不了多少字。然后呢，有了毛笔、墨汁和纸，后来又有了铅笔、钢笔，废话就开始多了。尤其是今天有了电脑，这个废话就成倍增长。因为许多规定性词、句甚至段落，如果用笔写要写好一阵呢，过去他就会省略一些，或干脆不写了，现在只要“梆”一按，就全出来了，何乐而不为嘛！一些同志给领导写稿子有一个心理，我也干过这个活儿，先把字数弄多一点，把稿子撑起来，显得很充实，显得卖了力气，领导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删嘛，有些句子只要写上了，谅你也不敢删。如果碰上个对文字没有兴趣的领导，他就照念，结果不仅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还把这个单位、这个地方整个文字水平拉下来了。

把文章写短还有一个办法：减少层次。我们目前写稿子一个普遍现象是层次太多。毛泽东曾经批评写文章层次太多是党八股的重要表现形式：“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 ABCD，小 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对比毛泽东的批评，我们今天还是有进步的，至少壹贰叁肆、甲乙丙丁是消灭了。但是现在无论讲话、文章甚至简报，汉语的一二三四，然后括弧汉语的（一）（二）（三）（四）；然后阿拉伯数字 1234，再

一个阿拉伯数字加括号(1)(2)(3)(4)，再下面还有一是、二是、三是……要是这样还不过瘾，还有黑体字、变体字等等。有些年轻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念稿的机会，不知道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就被这个搞糊涂了，念着念着自己就不知道念哪儿去了，念成一锅粥了。脑子清楚一点儿的领导还得引读，“好，我现在讲到汉字一二三四的四了……好，现在讲阿拉伯的1234了。”实际上文章的自然段落、句号、分号、逗号、黑体字，它都能起到分隔的作用，用不着那么多的中药铺格子。大家看十八大报告，三万多字，实际上就用了两个层次，一层是一二三四，然后括弧(一)(二)(三)(四)，少数自然段打头用了黑体字。如果依我们一些同志写的话，以上这些符号可能还不够，还要再启用一些符号比如“天地玄黄”或“赵钱孙李”才能区分得开。我有一次帮李瑞环同志起草稿子，他作了大量删节，又批了一句，“文到高处，言少而意多”。当然我们不可能简练到古人用竹帛书写那个时候，但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应是古今衡量文字水平高低的“普世”标准之一。

关于文字工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自己的稿子要经过自己的手，动手写也好，别人写了自己动手改也好，反正不要只剩下张嘴念稿的功能。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把写文章看作是秀才的事，如果领导评价一

个同志是个笔杆子、是个秀才，糟糕了，这不是表扬的话，这意思是说你就干这个了，你的前途也就这样了，相当于说你不会办事情。实际上写稿子的过程是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对工作的回顾、分析、部署的过程。不善于写稿子改稿子，对稿子不下功夫的领导，我以为不会是好领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周、刘、陈这些同志，都是实干的大家，同时也是写作的高手，这才是共产党文风的正宗。

（摘自：《秘书工作》 作者：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

庄聪生同志关于怎样写好领导同志讲话稿

按：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庄聪生同志关于“怎样写好领导同志讲话稿”这篇文章，立意深远、结构严谨、内容丰富、说理透彻，是他多年来为领导起草文稿的心得之大成。

研究室作为统战部的思想库、智囊团，其立室之本、兴室之道就是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而参谋助手作用怎么体现？很重要是要写好领导讲话稿。因为领导讲话稿，不仅体现的是领导同志的领导水平、决策能力、工作思路和个人魅力，同时由于领导的特殊身份，领导讲话又不只代表个人，往往承担着阐释方针、部署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实践等功能，

关系着全盘工作的开展，意义重大。一个会议开得好不好，活动办得成功不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讲话讲得好不好。

起草讲话稿，体现着研究室的理论功底和文字水平，反映着研究室对工作全局的把握和驾驭能力，是研究室几乎时时在想、天天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研究室的“重头戏”，或者说是研究室的主业。写好了领导讲话稿，研究室的工作就干好了一半；写不好讲话稿，其他工作也会受影响、打折扣。但要写出领导满意、听众爱听的高质量讲话稿，决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功夫，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一门综合艺术。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而言，每年要起草各类文稿几百篇，如何写好讲话稿的问题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和琢磨的问题。前几年，陈喜庆副部长召集研究室专门召开过座谈会进行研究，形成的会议纪要已经发给大家了。大家作为研究室主任，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我主要结合最近几年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工作实际，谈一些认识，与大家交流。主要谈四个方面，也就是把握特点、明确定位、领会要诀和必备素质。

一、要把握领导讲话稿的主要特点

领导讲话是机关各类公文中难度最大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命题作文”，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1、层次高。领导讲话一般不是针对和着眼于某些局部和具体问题的，而是站在全局和时代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和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政治理论、思想水平和工作层次都很高。这就要求起草领导讲话稿时，要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小人物敢于说大话”，时时处处站在领导者应有的水平和层次上思考问题。我经常给研究室干部讲，写领导讲话要会“上天入地”、“顶天立地”，“上天”、“顶天”就是要不怕站得高，就怕站得低；不怕想得深，就怕想得浅。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日常文稿承担得比较多的，主要是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领导的讲话，这方面的要求十分突出。特别是去年，我们承担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初稿的起草工作，可以说是统战系统最高规格的讲话了。在部领导的直接带领下，我们经过认真思考，明确了讲话应体现最高站位和最高层次，要求起草者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对形势的判断要高瞻远瞩，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不能仅仅站在统战部门的角度，写成专题工作会或统战部长会的讲话。负责初稿起草的同志牢牢坚持这一标准，在深入研究中央领导同志在其他场合讲话的基础上，结合统战工作实际，写一段比照一段，写一稿讨论一稿，努力使讲话稿符合领导同志的身份，做到大气、深刻、精辟、宏观，特别是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讨论以“五大关系”这一主线，将

统战工作与处理党和国家重大政治社会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度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按照这样的定位和要求，初稿形成后，陈喜庆副部长带着我们反复在室内进行修改讨论，并多次征求部有关局室、部内老同志、各地统战部门、党内专家学者以及党外人士的意见，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广泛听取和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在征求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意见时，很快被认可和采纳。这期间，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先后修改 20 稿，关于加强统一战线的文件稿初稿修改 60 稿，创统战部文稿起草工作的历史之最，可以说是“字字心血、句句汗水”。各地统战部研究室也经常给省委领导同志和部长起草讲话，他们的讲话对一个省的统战工作具有宏观指导意义，也应讲出应有的层次和高度。

2、权威性。领导者的地位、身份与职责决定了领导的讲话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某些重要场合的讲话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党的理论、政策和要求，是必须贯彻执行。所以，在起草领导讲话稿时，一定要做到科学严谨、稳妥准确，每一个重要观点都反复研究，每一个新的提法都多方论证，每一段文字都仔细斟酌，把领导需要讲的内容精当、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不随便照搬理论界的观点、社会上的看法，不讲没把握、未定性的话，不讲有争议的观点，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语出惊人而讲过头话、

甚至“乱放炮”。这是近年来我们十分注意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起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稿时，对文稿有一个突出要求，就是要讲“有出处、有把握”的话。我们坚持科学性与创新性有机统一，努力使每次的提法都准确鲜明、没有歧义，每段文字都经得起推敲。如果拿不准，宁可不用。当然，起草文稿不能照抄照搬，要鲜活生动，善于从别的领域吸收有益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是，尽可能用中央领导所讲过的、党内理论专家所认可的、人民日报规范提过的观点，如果实在吃不准，就不能作为定论来用。当然，要注意把握好度，不能一味追求准确规范，把领导讲话稿写成全是“正确的废话，没用的空话，好听的套话”。

3、涉及面广。领导的讲话内容十分丰富，不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个领域，常常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军事、法律、党建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什么内容都可能讲到。因此，写好领导讲话稿要求视野广阔、知识面宽，尽可能了解各方面知识，尽可能熟悉各领域的工作。但是，在“包罗万象”的同时，也要做到收放自如，既能放得出去，还要拉得回来，既要纵横捭阖，又能秉要执本，使讲话既能体现较大的信息量，又不至于把主要观点淹没在大量材料中。

4、个性突出。讲话稿最终是要由领导讲出来的，所以

必须尊重和体现领导的个性。每一位领导讲话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和要求，有的领导讲话涉及古今中外，喜欢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有的领导讲话立意高远、气势恢弘，喜欢讲时势；有的领导讲话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喜欢举例子；有的领导讲话朴实无华、通俗简洁、干净利落，喜欢用群众语言；有的领导讲话注重创新，喜欢讲新观点和新语言。同一篇稿子，可能这个领导欣赏，另一位领导不认可。因此，讲话稿在体现基本要求的同时，把领导的意图领会清楚、体现充分，否则领导讲起来拗口，下面听起来也别扭，起草人的辛苦也多半白费。领会领导同志意图，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平时要做有心人，培养自己的悟性，多听多记勤归纳，珍惜每一次与领导接触和沟通的机会，或者直接听取、记录领导的口头交代，或者拟出提纲或构思，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领导汇报。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注意把握以下两点。一是认真领会领导总的意图，把握其总体要求，特别是体会领导点到但没有具体展开的深层次的内容，而不是领导讲到什么份上，就只写到什么份上。尤其是在自己发挥余地比较大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能体现写手领悟领导风格和意图能力的时候。二是对领导的意图进行深化和拓展，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工作情况的最新变化，及时把握可能影响领导思路发生变化的各种要素，有预见性、创造性地“发展”领导的讲话

意图。

二、要明确领导每次讲话的定位和方向

大家都是研究室主任，有些稿子是自己操刀、亲自上手，有些则是指导、带领干部去写。不管是组织指挥还是身体力行，稿子最终是从你手中出去的，把关、定位的职责都在你身上。而能否定好位置、选准主题正是一篇文稿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近几年，我们在准确定位和把握方向方面做了一些探索，重点是抓住以下四点。

1、打造亮点，使讲话有点睛之笔、留下痕迹。名人、伟人之所以名扬千古，除了他们有睿智的思想和超人的智慧外，就是他们的语言往往是名言至理。在这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堪称楷模。读过毛选四卷的人，至今过去几十年了，还能大段大段背出毛主席语录。为什么，因为毛主席的话是革命的真理、共产党人行动的准则。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短短几个字，可以写出几千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句顶一万句”。政治家是这样，文人也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都是千古绝唱的妙语。

邓小平同志说过，当干部就是用“笔杆子来领导”。这

里的“笔杆子”指的是讲话和写文章。所以，要写出有影响的稿子，很重要的是必须有点睛之笔，有突出的亮点和闪光点。“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就是这个道理。近几年，我们在文稿起草中十分注意培育闪光点，挖掘出一些最精彩的东西，把它突出和烘托出来，这样讲话稿才能有深度、出思想，而不是平平的流水账，既让听的人容易记住文稿的中心思想，又在某一领域内叫响了一些提法。比如，中央颁布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5号文件后，根据部领导的意见，我们在吃透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总结出5号文件作为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重点是加强制度化建设，实质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核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提纲挈领的概括，既抓住了5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又易于人们掌握和学习贯彻。又比如，在民主党派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中，我们根据部领导的思路，系统研究和概括了政治交接的内涵，即“重点是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老一辈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关键是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核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目的是加强参政党建设，巩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推动和实现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

不仅成为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工作座谈会讲话中的一大亮点，也使后来开展的政治交接教育活动有了“魂”，各民主党派普遍反响很好。再比如，在起草部领导今年中央社院秋季开学典礼讲话稿时，我们概括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即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在领导核心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制度设计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实现形式上，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在目标取向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可以说是国内理论界最早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内涵进行的规范和明确界定，目前已经成为各方比较公认的一个阐释。还比如，结合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实际，我们提出并概括了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五个方面的政治责任，即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责任、高举旗帜的责任、服务大局的责任、团结合作的责任、教育引导的责任。针对如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概括了五个方面的内涵，即“爱国报国的责任、发展企业的责任、遵纪守法的责任、公益慈善的责任、道德自律的责任”。这一概括既比较切合实际，又易于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所认同和接受，

成为继“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后开展团结引导工作的又一个响亮的号召。我们感到，长文章好写，点睛之笔难求。只有对情况熟悉了、把道理想透了、将认识深化了，并作出凝练的概括、通俗的表达，才能写出有影响的讲话，才能留下“痕迹”。

2、敢于突破，把很少写、不熟悉的题材写成精品。领导讲话涵盖面广、内容丰富，既有工作方面的讲话，也有理论方面的文章，还有各种场合的演讲和致辞。要写好领导讲话，只会写一类是不够的，必须门门熟、样样精。面对一些不熟悉甚至比较陌生的领域，更要下功夫深入学习，并运用长期实践积累的经验，以他山之石来攻玉，把没有写过的文稿写出“彩”来。这几年，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文稿起草有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完成常规性讲话的同时，写出了一批精彩的演讲稿和理论文章。经过几次实践，我们感到，越是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有时越能写出新意。比如，前年起草部领导在“中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稿，对我们是个考验。因为演讲类型的文稿我们很少写，对于中华文化的掌握和了解也有限。特别是这次演讲听众既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也有来自海内外的众多知名人士；既有在自然科学界享有盛名的科学家，也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专家学者；既有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还有才华横溢的

艺术家，如许嘉璐、董建华、杨振宁、金庸、陈映真等蜚声海内外的名人、学术大师和文学泰斗。而且论坛召开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邀来大陆访问，刚刚在北大和清华作过演讲，反响很大。经过研究，我们提出这个演讲稿要改变过去的大“一二三”套“123”的路子，以能够入选中学课本为标准，手法要体现大写意、大手笔、大气势，语言方面要鲜活、富有哲理，文章要精彩、大气。按照“大开大合、文采飞扬”的基调，我们分析了大量中华文化的资料和专家学者的文章，同时从晚会主持词和电视片解说中汲取营养，精心撰写，反复推敲，将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东西挖掘出来，浓缩为几千字，领导同志作了演讲。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篇演讲稿既抑扬顿挫、充满激情，而又妙语连珠、精辟深邃，是一篇阐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力作，使人听了很难忘、过后常思量。这篇演讲稿现在已经成为许多海外中文学校的范文。

这篇演讲稿的成功，不仅使我们对演讲稿的风格、套路和要求有了一定把握，而且极大地鼓励了我们敢于承担统战领域之外文稿的信心。去年起草部领导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时，虽然题材也不太熟悉，听众又都是国内外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但我们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一主题的内涵，提出要

注意把握“主题鲜明、政治性强、宣示性内容多”的特点，既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对和谐世界进行阐释，又要对佛教界承担合作责任及其和平使命提出殷切希望。基于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将标题定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期待和谐共生的世界”，并从“共同繁荣，民主平等，团结合作，相互包容，持久和平”五个方面，全面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对总书记提出“和谐世界”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同时，论述了佛教教义的和谐思想与和平理念与和谐世界的关系，运用了一些充满佛家圆融智慧的语言，渗透着佛学思想和精神，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兴趣。在起草年初部领导在国际《道德经》论坛上的讲话时，我们深入分析了学术界、宗教界关于《道德经》的权威论点，将重点确立为挖掘和弘扬《道德经》的时代精神和内涵上，希望演讲稿能够揭示出这一经典著作“经世而长存，历久而弥新”的丰厚价值。我们将《道德经》中“道生万物”、“无为而治”、“为而不争”、致虚守静等核心内容，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思想、爱民治国的理念、和以处众的原则和立德修身的哲理，并从遵循客观规律、倡导和合友善、注重律己修身三个角度，阐发了《道德经》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内心的和谐的时代意义。演讲稿引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反响。这几篇演讲稿写下来，我们对演讲稿的把握已经比较游刃有余了，甚至

已经成为了一个强项。

在理论研究文章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心得和体会。前年在研究我国多党合作的发展历史和多党合作制度优越性时，酝酿撰写一篇理论文章。初稿形成后，感觉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但内容比较庞杂、不够系统深刻。我们总结了过去撰写理论文章的经验，感到需要在现有内容上加以提炼概括，并拟定一个准确、到位、传神的标题。按照部领导出的思路，概括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三性”（历史必然性、伟大独创性、巨大优越性）和“四个崭新”（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制度形式、崭新的政党关系、崭新的执政方式和崭新的民主实现形式），使整篇文章有了主线和精髓。这篇文章经过精雕细刻，有很多创新性的观点，发表在《求是》杂志上。

3、推陈出新，使讲话不弹老调、常讲常新。对于长期从事文稿起草的人来说，最难写的稿子莫过于份量很重又要常讲的文稿。因为这类文稿要么是常规性的、惯例性的，框架、风格、内容都比较稳定，要么是同一个主题，要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反复讲的。这类文稿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写法，很容易老腔老调老面孔，落入俗套，味同嚼蜡，讲一堆正确的废话。我们感到，对于这类文稿，一定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在主题思想一脉相承的前提下，尽可能用新概括、新材料、新语言，使人耳目一新。比如，最近部领导在学习

贯彻第 20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由于听众都是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统战部长，而且会议精神已经贯彻落实 1 年多了，基本精神大家都非常了解，对于统一战线面临的“五情”和“五大关系”不是陌生而是很熟悉。为了突破和超越以往的内容和写法，避免因容量大、篇幅长而使人听久了分散注意力，我们按照部领导出的思路，采取鲜明观点加生动例子的写法，不过多论述，不过多说理，而是着重讲有现实针对性的重大判断和事例。操作中，讲世界大背景时不再泛泛地就“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展开论述，而是有针对性地把国际方面的挑战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快速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国际敌对势力的遏制和打压，并列举了大量的最新事例；讲统一战线自身时从新领域、新课题、新任务、新手段作了概括，对论述涉及我国政治社会领域“五大关系”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新的提炼，如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方面的“五个越来越”（一是全党全社会对多党合作越来越重视，二是多党合作制度化水平规范化程序化程度越来越高，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用的发挥越来越充分，四是参政党建设越来越得到加强，五是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凸显）、民族关系的“五个好”（一是民族理论研究得好，二是民族政策制定得好，三是民族干部培养得好，四是民族文化发展得好，五是民族关系处理得好）、

对台工作方面的“一个新主题，三个方面新成效”（“一个新主题”，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平发展理应成为当前两岸关系的主题，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三个方面新成效”，即两岸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新变化，对台政策实现了新突破，争取台湾民心取得了新进展）等，尽量做到每个重要观点后面都有事例来佐证和说明，以新的素材来弥补框架老的问题。我们还精心设计使用多媒体，丰富了讲话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使讲话有声有色、图文并茂，产生了较强的感染力。

又比如，胡锦涛同志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后，统一战线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部领导先后在8个场合围绕这一主题作讲话，即民主党派新任主委培训班、全国工商联会长、党组书记培训班、部副局级以上干部理论务虚会、接见海外留学人员团体负责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座谈会、中央社院秋季开学典礼、学习贯彻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题研讨班和经验交流会。准备这些讲话稿对我们来说是很棘手的事，因为“6·25”讲话的基本精神一句也不能动，但对精神的解读和阐释老炒冷饭不行，必须结合不同对象和场合，一次有一次的角度，一次有一次的重点，一次比一次深入。我们确定“基本精神场场讲，不同场合阐述不同重点”的原则。如在民主党派主委培训班和工商联会长、

党组书记培训班上讲话中，重点阐释了“6·25”讲话的基本精神，主要概括为“高举一面伟大旗帜，坚持一个根本指针，把握两个重要关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推进五个方面建设”；在接见留学人员团体代表讲话中和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着重阐释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们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抓好了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社会和谐与和平外交四件大事；社院开学典礼讲话时，主要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理论务虚会和学习贯彻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侧重讲统一战线如何结合实际贯彻讲话精神。由于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部领导这几次讲话没有出现“炒冷饭”，而是老题材讲出了新意。为了保护创新、鼓励创新，平时我们鼓励大家敢于写、放手写，大胆尝试，不怕失败。有不少年轻干部，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提出了不少有独特见解的思想，写出了许多鲜活、精彩的语言。事实让我们体会到，新手写稿，往往更能突破框框；宽容失败，更能激发创造活力。

4、统筹规划，使讲话步步深化、形成体系。文稿起草工作是对领导人思想和决策进行阐发和提升的过程，也是对领导人形象和风格进行全面包装和塑造的过程，要有长远谋划，有一个总体的、系统性的设计，形成一个层层深入的思

想体系。近几年，我们十分重视这一点，叫“写一步看两步想三步”，使讲话一步步深化，指导中心工作稳步有序推进。比如，筹备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文稿时，除了总结与部署工作外，我们每年都挖掘一个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的理论专题，在讲话第二部分进行深度阐述。比如，2003年讲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发展战略，2004年是统一战线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2005年是统一战线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6年是分析影响“五大关系”和谐的现实问题和有效解决办法。近几年全国统战部长会议讲话中的理论部分，串起来就是对统一战线贯彻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全面系统阐释。又比如，部领导每年在中央社院春季、秋季开学典礼上都要作两次讲话，其中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是个重要内容。这几年，我们就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政治交接教育活动，都进行了专题设计和论述，这些讲话串起来，就形成了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理论体系。再比如，中央统战部每年年终都要召开述职大会，每次部领导都作讲话。我们对讲话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规划，每次围绕一个主题，五年来分别讲了“调研兴部、制度建部、从严治部、文化塑部、人才强部”五个主题。从这五句话中，可以看出领导同志抓机关建设的工作思路在逐步深化和递进，形成机关建设的完整体系和

鲜明脉络，现在已经在全国各级统战部门叫得很响。

这几年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为领导同志起草讲话稿，大的思路、主题和基本框架主要是领导同志提出和确定的，我们承担的主要是整理、起草和加工的任务。每当承担一篇重要文稿起草任务时，部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常和我们一块研究提纲、提出思路、谋篇布局，还常常带着我们一起推稿。这几年，我们在起草文稿过程中，从几位部领导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政治把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局势判断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可以说，每写一篇稿子，思想理论政策水平都得到一次锻炼和提高。当然，我们在写稿中也是尽心尽责，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力争每次都有创新和突破。特别是我们要求“干事要写到黔驴技穷才出手，处长要弄到江郎才尽才放行，主任要改到山穷水尽才上报”，每篇稿子几乎都是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保证了文稿质量的提升。

三、要掌握领导讲话稿起草的几个要诀

文稿起草既是一种“遵命文学”，也是一项融入起草人主观努力的创造性劳动，既要考虑“谁来讲”、“以什么身份讲”，也要把握“对谁讲”。也就是说，成功的文稿必须同时兼顾领导人、起草人和听讲人，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我们的体会是要做到“一个忘记、两

个记住、多个参与”，也就是“忘记自我，记住领导，记住听众，集体推稿”。

忘记自我，就是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忘记自己，从领导的角度写稿子。写领导讲话稿，阐述的是中央和上级的精神，体现的是领导的意图，不是讲自己的观点，更不是写自己的文章。大家都在不同场合听过很多领导的讲话，可能有这样的体会，有的稿子理论性、学术性太强、太专，不符合领导的身份；有的稿子部门色彩太重，只是从业务角度展开；有的稿子过于复杂、晦涩，讲起来很别扭、不顺口，甚至在讲话中还要不时看看上下文，临时琢磨其中的含义。这其实与起草人没有忘记自我，将自我风格和习惯带入文稿都是有关的。因此，对起草人来说，不能有自以为是和先入为主的意识，更不能想通过领导讲话体现自己的思想，使领导讲话成为自己的“传声筒”。当然，写领导讲话也是做文章，但它是从领导者的角度写文章；写领导讲话也可以反映作者的研究和研究成果，但必须符合领导的意图，符合领导的身份。对领导提出的修改或者否定性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对自己工作的否定，而要在如何更好地领会领导意图上找原因、做努力。这些都要求干部必须有奉献精神，忘记自我，甘于寂寞，当无名英雄。

记住领导，就是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必须认真研究和

把握领导讲话的意图、要求和风格，写出领导的高度、领导的深度、领导的风度。这种能力不是一日之功、一役之劳，必须经过日复一日地积累和思索，并切实体现在写作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中，体现在框架的构思、材料的取舍、语言的润色等方方面面。这几年，研究室在把握部领导风格方面下了一些功夫。比如，为国家领导人起草讲话时，一方面，要写得生动实在，又不能写过于具体的内容、过细的材料。另一方面，要写得有深度和高度，不能讲得太理论化、学术化，即使是参考了别人的研究成果，也都要变成领导讲话的语言。又比如，有的领导心比较细，考虑很周全，起草文稿时就要尽可能丰富严谨，努力把领导重点想讲的几个方面讲充分，多用形象思维，多用鲜活文字。“记住领导”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和在实践的：“最好的粮食交国库”，把最精华的思想、最翔实的材料和最生动的语言贡献给领导同志的讲话。

记住听众，就是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要了解、反映和符合听众的需求。有“党内第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曾提出，衡量文章是否精品佳作的三个审美标准，即要吸引人看得下去、要使人看得懂，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可以说，与过去相比，领导越来越关心讲话稿在听众心中的感受，越来越在意能不能与听众实现良好互动。听众的反应不仅决定着文稿的

实际效果，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领导那里，影响着领导对文稿的满意程度。因此，起草人既要关心领导讲什么，更要关心听众需要听什么。既要使领导满意，更要使听众满意。要搞清楚领导对谁讲话，听众最想听什么，最关心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找到领导与听众的最佳结合点，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讲得切题，听得解渴。这几年，我们十分注重研究听众，结合不同听众的要求“看人下菜”。比如，对港澳台海外朋友讲话时，要做到“三多三少”，即多讲方针政策和祖国发展情况，多讲团结鼓劲肯定的话，多讲澄清模糊认识的话，少用内地语言，少讲大话空话，少提希望要求。对统战部门的同志讲话时，要单刀直入，要求明确，任务具体，有概括有重点，操作性强，不能空泛说教、不着边际。对党外人士讲话时，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情况讲清楚，把道理讲充分，使人信服。同时，要多用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扩大知识面，增大信息量，不能讲官话、打官腔、摆官谱。

集体推稿。近几年，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不小功夫，探索了一条成功经验，就是通过集体推稿，使每一篇领导讲话稿成为群策群力的结果、共同智慧的结晶。我们总结出了集体推稿的三大优势和五条操作原则。三大优势是：在文稿质量方面，推稿能够广集众智，确保写出上乘的讲话稿；在干部

成长方面，推稿能够使干部在思想碰撞中获得启发、共同提高、增长才学；在营造环境方面，推稿能够形成民主讨论、活跃思想、良性竞争的氛围。五条操作原则：一是要有“领军人”。这个“领军人”是推稿的主导者，必须有权威，既要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文字驾驭能力和民主作风，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众人的智慧，在意见出现较大分歧的时候，要能拍板定夺。二是要提倡解放思想。让所有参与推稿的同志畅所欲言，只要对文稿有帮助，什么观点都允许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做到英雄不问出处，充分发扬民主，不论年轻年长，不论职级高低，不论学历资历深浅，谁对听谁的。三是要善于兼采众长。推稿中大家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有时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遇到这种情况，要注意耳听八方、各取所长，既要吸收、听取赞同的意见，更要仔细分析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的意见往往能够启发你采用一种新的思路、角度和表述方法。推稿中还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积极性，照顾他们的面子。有的年轻同志憋了半天才说出来一两句话；要细心倾听，即使他讲错了也不要一下子把人家噎回去，否则以后他就不敢说话了。四是要灵活处理。由于每篇初稿的质量不一样，基础较差的往往要费很大的劲。遇到“推不动”时要先跳过去，一会再回过头来推，不能一根筋，不撞南墙

不回头。意见出现争执时，不要在细节上过于纠缠较劲。遇到哪一块确实不成熟的，一时难以推下去，要指派一两个干部先去改或重写，写好再拿来大家推。五是要注意培养锻炼干部。推稿时，要尽可能多让一些人参加。在起草第 20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央领导同志重要讲话时，我们一次集中了 19 名业务骨干逐字逐句进行推稿，保证了文稿的质量。平时推稿中，我们要求新同志每次尽量参加，没有起草的干部也可以参与。这样，室领导一边带着推稿一边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收到“改出好稿、培养队伍、大家提高”的“一石三鸟”的效果。这几年，研究室年轻同志特别愿意参加推稿，把推稿当作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许多同志参加推稿后，常常在一起议论交流推稿的收获和体会。

四、要具备写好领导讲话稿的基本素质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篇好稿子是起草人理论政策水平、实践工作经验和文字驾驭能力的综合体现，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得到的事情，必须有一个“厚积薄发、游刃有余”的过程。这就要求从事文稿起草的同志必须打好基本功，刻苦学习，长期积累，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具体来说，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全面掌握基本理论和政策。对领导讲话来说，理论是灵魂，政策是生命。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起草的领导讲

话稿就会缺乏思想、缺乏深度；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起草的领导讲话稿就会缺乏指导性和实效性。这几年，我们要求干部要利用一切机会，抓紧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中央的最新精神，学习统一战线各领域的方针政策等，特别是第 20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高理论政策水平。这样，起草领导讲话稿时才会有“底气”。

2、要学习各领域、各方面的知识。随着统战工作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扩大，领导讲话稿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除了需要掌握与统战领域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还要熟悉市场经济、现代科技、法制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和时事政治等。这些年，我们要求干部在熟悉了解统一战线的历史和人物、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加强涉及各领域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既做专家，又做杂家，力求从多方面丰富自己。有了这样的知识储备，写出的讲话稿才能深入浅出、信手拈来，才能使讲话有厚度、有磁性。另外，平时大家在一起交流讨论问题、进行思想碰撞，海阔天空“侃大山”，上至天文地理、国际大事，下至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往往能开阔思路，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产生思想火花，这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方式。有些知识和灵感说不准什么时候在写稿时就冒出来了、派上用场，写出来还很精彩。

3、要熟悉各类讲话稿的基本规范和技巧。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范围，决定了领导讲话种类的多样性。而不同种类的讲话，如会议讲话、工作报告、辅导报告、座谈发言、即席讲话、演讲致辞等，其特点不一样，要求就不一样，写法也不一样。要写好领导讲话稿，必须注意了解和熟悉各类讲话稿的特点，把握其要领，掌握其写作技巧，做到“量体裁衣”。我们曾对一些类型的讲话稿的特点和要求作了概括。比如，讲话稿的特点是容量大、篇幅长，听久了容易分散注意力。所以，我们对讲话稿的要求是标题要醒目，观点要鲜明，事例要生动。演讲稿的特点是篇幅短、有激情。我们要求写得有理、有情、有势。有理，就是要有说服力，说得在理；有情，就是要有亲和力，能感动人；有势，就是要有气势，能体现领导人和政治家的风范。即席讲话的特点是时间短、面对面。我们要求简明扼要，观点鲜明，特别是要有概括和提炼，做到通俗易懂、上口易记、富有特色，切忌平铺直叙，冗长无味。

4、要注意平时收集和积累资料。领导讲话有轻重之别，也有缓急之分。一般来说，起草领导讲话稿有较充分的准备时间，但有时又是“火线救急”，也叫“急就章”，从布置到完成仅有一两天的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时间紧任务重。而讲话稿需要的材料又是多方面的，也不会因为时间紧

迫而降格以求。这几年，我们要求干部平时必须注意收集和积累有关资料，写今天想明天，“吃在碗里、看在锅里、买回来放在菜篮子里”，避免书到用时方恨少，文到写中无词急。当然，收集资料不能依赖资料、照搬照抄，满足于报上抄一点，网上下一点，自己编一点，例子加一点，而必须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吃透材料，从中提炼出观点，写出有份量的稿子。

5、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领导讲话稿的高度、深度、厚度，其鲜活、生动、新意，其指导性、针对性、有效性，都建立在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没有调查研究或调查研究不深入，起草领导讲话稿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出现米不够、水来凑的现象，或无的放矢、隔靴搔痒，或话不到位、书生意气，空话大话套话连篇。只有经常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挖掘下情，不断形成新认识、新观点、新思想，才能把领导讲话稿写准、写深、写实、写新，避免“情况不明胆子大，思路不清办法多”。这几年，我们每年都要确立研究室的重点课题，在文稿起草工作量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保证一定的调研时间，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很多都已转化到领导讲话和文件中。特别是为准备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系列文稿，在部领导的带领下，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大量深入调研，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

统一战线”的总课题，提出了 18 个重点子课题组织协调全国力量进行攻关，先后到 20 多个省区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协助部里召开全国统战部长南北片会。正是因为始终重视调研，才为领导讲话稿的起草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鲜的素材、观点和语言。

总之，要把以上这五个方面落到实处，真正掌握其精髓，还要靠一个“勤”字。具体要做到“五勤”，即眼勤、脑勤、嘴勤、手勤、腿勤。所谓眼勤，就是要多看多读，用多方面知识来丰富自己，以独到的观察来发现问题。所谓脑勤，就是要多想，既要想问题、想全局、想大事，也要想结构、想角度、想文词，以存乎一心，求运用之妙。所谓嘴勤，就是要多请教、多交流、多讨论，不懂就问，以问求知，切不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所谓手勤，就是要多写多练，在自己的反复实践中感受、总结、领悟、升华，做到稿子不厌百回写，本事但求不断长。我经常和干部说，写稿的人手是不能停的，手一停就生，手一生立刻就跟不上。一个月不写稿，三个月写不好稿。就好比以前唱戏的名角儿讲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一天不唱戏，自己听得出来，三天不唱戏，同行听得出来，十天不唱戏，观众听得出来。所谓腿勤，就是要多调研，到实践中求真知，到基层取真经，以行万里路来写好领导讲话稿。

